

# 臺灣民主國與劉永福

謝佳卿

光緒甲午之際，中日兩國因為朝鮮問題而關係緊張，清廷鑑於日本曾於一八七四年出兵臺灣，早有併吞臺灣之心，恐其利用機會再度侵臺，遂於中日開戰之後，即加強防備臺灣。(註一)時任南澳鎮總兵的劉永福(註二)，因於中法戰爭之時，率領黑旗軍在越南有出色表現，遂於此時，被派至臺灣幫辦防務。甲午戰爭結束，日本果然趁機要索臺灣，清廷大臣紛紛上言割台之不可行，臺灣紳民也群情激昂。

馬關條約簽定，割讓臺灣成為定局，欲借中國之力以求外援而不成，遂倡議成立臺灣民主國，試圖以「自立」於中國之外的獨立地位，得到一個求得外援的「轉機」。然而歷經努力仍然尋求外援不成，來自中國部份官員的支持也在清廷屢次的禁止之下而逐漸示弱，然而卻在臺灣人民的努力下，正式展開一連串的抗日事件。

## 一、臺灣民主國成立概況

唐景崧與臺灣北部的士紳為反割台而進行一連串的策劃，五月二十五日臺灣民主國的旗幟在臺北升起，五月二十八日及五月二十九日，臺南、安平與打狗也分別升起了民主國的虎旗，(註三)而遠在南部的劉永福亦被任為民主國將軍。

六月七日，日本進佔臺北城，唐景崧內渡，臺灣民主國在北部的勢力全然潰敗，在聲聞唐景崧離臺內渡之際，正在

打狗旂后一帶視察的劉永福遂由旂后北上臺南府。因為當時清廷早已下令各級官員自臺灣撤退，清屬官員紛紛內渡，動盪的情況可見。此際，劉永福的到來不僅安定了民心，也穩定了紛亂的局面，再加上擁有抗法英名，紳民見劉永福的到來，希望與感激之情遂寄託在他身上。(註四)劉永福擁有相當的民意，使他在南部的權力與聲望更上升一層。(註五)

此外，當時駐守於臺南府的重要官員則皆於六月遵旨內渡，其中包括：駐守於臺南的臺灣鎮總兵萬國本，臺灣道台陳文騷，臺南知府朱和鈞，以及安平縣知縣謝壽昌。(註六)而在萬國本與陳文騷在知道臺灣已勢無可為而離臺之際，皆將印信交給劉永福，劉永福自此駐於臺南府，其間的防務及行政事宜，一切悉歸他主持，這更使其掌握了行政與軍事上的實際權力。(註七)在掌有臺南府的主權後，更加注意在臺南各處加強防備，布袋嘴、鳳山、旂后、東港、恆春一帶各有駐兵。民間自行組練的民團亦分駐各要塞，亦皆由劉永福控制。(註八)且透過文告，劉表明留臺抗日的決心，他告示於民：

照得倭寇要盟，全臺竟割，此誠互古變異；為人所不忍聞、所不忍見；更何怪我臺民髮指背裂，誓與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詔，而為自主之國！本幫辦即以越南為鑑，迄今思之，無日不撫膺痛哭追悔無窮……自問年將



六十，萬死不辭……本幫辦亦猶人也，無尺寸長，有忠義氣，任勞任怨，無詐無虞……如何戰事，一擔肩膊；凡有軍需，紳民力任。誓師慷慨，定能上威天神，慘淡經營，何難徐銷敵愾？（註九）

且與臺灣人民立下抗日盟約，（註十）確實有心要兼負起守臺抗日的工作。

六月二十九日，臺南士紳齊集，有數千人集議，試圖再起民主國，繼續以民主國抗日。紳民公推劉永福為臺灣民主國大總統，且鑄銀印曰：「臺灣民主國大總統」，紳民有以此印留住劉永福的熱切，然而劉永福卻三次卻不受印。而要求人民有銀幫銀，有錢幫錢，無錢幫米，無錢米之人則幫力，以渡時艱，且一再表示願意結合軍力幫辦到底，有印無印皆無助於事。（註一一）

雖然劉永福的承諾確有忠義之氣，然若就劉當時的處境及立場，實不難了解其何以不受印。就劉永福的文案吳質卿所言，當時士紳向劉送印之際，其言：「我乃大清臣子，何用此印為？」而且在招集將士築壇誓師之時，所有一切條教號令，仍書「大清國欽差幫辦臺灣防務閩粵南澳總鎮府」官銜。（註一二）仍以清臣自任，企圖使臺灣能再回清的版圖。臺灣民主國既只是臺灣重回清領土的過渡，則儀式名目能簡則省，一不必引起中國當局的忌諱，再也不必違及其盡忠於清廷的信念。然，雖無授印，但在此次的送印與正式誓師之後，劉永福繼續在臺灣南部維持一個抗日勢力的情況便更加確定了。

這個「撫有兩府（臺中、臺南）八縣（恆春、鳳山、嘉義、安平、苗栗、雲林、彰化、臺灣）一州（臺東）」（註一三）

的勢力，當時英國駐安平（R.W. Hurst）便將之稱為「南臺灣民主國」（South Formosa Republic）。（註一四）戴維遜也明白指出，在日本佔領臺北之後，日本所必須面對的即是「位於臺南府的臺灣民主國」，更是強調南臺灣民主國乃是北臺灣民主國的延續之觀念：

此時臺灣的重鎮就是在臺灣南部的臺南府，也就是臺灣民主國的首都。以前所屬於唐景崧的守備軍，現在已歸屬於遠在南方的劉永福。如此說來，日本雖然佔領臺北，但並不能說就是臺灣民主國潰敗之時，而只是將臺灣民主國改組，且將其地點改往南部而已。（註一五）

很明顯的，日軍勢必得以相當的兵力與時間完成全島的底定。雖然在臺北的臺灣民主國在日軍進駐時便告陷落，日本在臺北成立了殖民政府，對北部的進取也日漸一日。日本以為，就如攻陷基隆，再而陷臺北一般，可以輕而易舉地在短時間之內收取臺灣，根本無須大軍壓境，（註一六）殊不料，劉永福在臺灣南部所堅持的反抗勢力，讓日本雖然在六月初即輕易地接收了北部臺灣，進展到彰化以下，卻已是在集結了四個師團勢力的十月下旬，這對日本來說，是始料未及的，且造成人力財力軍力的損失，使日本在日後治理臺灣，更加不敢掉以輕心。難怪日人要嘆謂：

臺灣僅是最爾小島，尚不及遼東的十分之一，劉賊的兵力也僅一百營，不過往昔遼東兵力的一半。如此狹小的一塊地方，兵員又如此的少，竟然要費上幾個月的時間才得以戡定奏功。（註一七）

領導南臺灣抗日勢力的劉永福是日軍在當時最引以為戒的「賊首」。劉在四個多月的堅持之中，所擁有的軍備與守衛對日本



所造成的困擾固然可見，然而卻也有堅「守」的侷限與困頓，致使他於民主國在臺北潰敗之後，雖然仍然將抗日的勢力在中南部堅持了四個多月之久，最後仍然不敵環境的困頓及本身信念的動搖，終於在十月十九日趁夜離開臺灣，結束了民主國延續下來的抗日勢力。

## 二、台灣民主國的軍事佈防與兵員問題

### (一) 劉永福的軍事佈防與軍力

一八九四年，中日兩國因為朝鮮問題而緊張，清廷鑑於日本曾於一八七四年出兵臺灣，早有併吞臺灣的企圖，深恐日本利用機會再度侵臺，遂於中日開戰之後，即加強防備臺灣，命令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酌帶兵勇至臺幫辦防務。(註一八)當時劉永福帶著舊兵與為補舊兵之不足而再募之新員，共四營軍，加上義子李成良新招的兩營軍，共六營，於八月一日成軍，在廣東潮州的汕頭等候輪船欲前往臺灣，(註一九)而就在汕頭候船期間，臺灣巡撫邵友濂命令劉永福帶兵直接往臺南駐守，劉遂於九月三日自汕頭起程，乘「駕時」號船艦(Cass)於九月四日直接行抵安平。(註二〇)劉永福抵臺之後，暫時安頓在縣衙附近，軍隊亦分駐於臺南城與安平一帶，(註二一)

一八九四年十月，唐景崧上任臺灣巡撫，劉永福遂親自北上與唐景崧相商希冀往駐臺北事宜，卻被唐景崧拒絕，只得再回南部駐守。劉於當時離開臺北，馬上便轉往臺灣南部各地視察軍務防備情況。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赴澎湖媽宮及澎湖各離島視察要塞、砲堡，十八日返回臺南，二十五日再赴打狗，二十七日再至打狗要塞及砲臺視察檢閱，且

南臺灣的恆春軍營與海上的防禦措施亦在他的視察範圍之內。就在當時，他曾以廣勇加駐於恆春，為恆春的防備增加了力量，一直到十二月十四日劉才再返回臺南。(註二二)根據當時居住在臺南的英國籍醫生邁爾斯(W. Wykeham Myers)所觀察，臺灣的軍事防備一直都是令人相當失望的，據他所述：「大部分沿海要塞皆由淮軍駐防，並普遍處於即將公開嘩變的緊急狀態……如果臺灣不得不靠這些士兵來保衛的話，那麼攻克它將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註二三)然而在劉永福來臺幫辦之後，邁爾斯醫生卻以為這是臺灣軍備轉好的契機，對於劉永福來到南臺灣之後所做的軍務防備情況，他持有相當的肯定，其言：

劉永福及其數百名士兵的到來已經使形勢有所起色，而且他已經制定一個更加令人滿意、也更加難以對付的作戰計畫……劉永福從北到南認真地考察了全島，並仔細視察了所有的軍營。(註二四)

一八九四年年底左右，劉永福仍以臺南府為駐軍本部，後來因為駐守區域劃分不清而有權責不明的麻煩，再加上鳳山與恆春一帶距離太遠以致鞭長莫及，(註二五)於是劉永福會商於臺灣鎮、道，與萬國本分地防守，以旂后為界，以北屬萬國本，以南歸劉永福。在區劃明白之後，劉永福在他的防守範圍區域應安置地雷、碰雷及電雷者，皆做一妥善的安排，若將劉永福的防備措施相較於此前的情況，絕對是更為周密妥善的。(註二六)

甲午之際，清朝為因應日本侵掠，有幾度陷入危局之中，劉永福幾次都在被調離臺灣前去解決危境之列，(註二七)雖然幾次也都因為臺灣本身也面臨危機而調往不成，但是，



劉永福本身所擁有軍力不足，也是不被調往的考量因素。但就在調與不調之間使得劉永福得以申調更多的兵員至臺擴展軍備。(註二八)因為劉永福習慣於帶粵軍，於是在清廷的認可下派員往粵增募四營。(註二九)一八九五年一月七日，劉永福新募集的粵勇四營在船艦「駕時」號的運輸下從黃埔抵達安平，隨船而來者還有相當數量的軍火。駕時隨即開往淡水，一月十三日且從淡水載來一千名湘勇，並將之暫時駐守於臺南北部，同此之時，也從淡水運來相當多的軍火，軍隊對於槍砲的訓練也在進行中。(註三〇)二月八日，唐景崧建議將徵調而來的四營粵勇隨劉永福調駐於鳳山及恆春一帶，以加強這一地區的防守，(註三一)劉永福遂於二月十日將這二千名粵勇帶到打狗，且將之駐紮在打狗英國領事館附近，而其駐防總部則設在距離領事館七哩之外的埤頭(今鳳山市)。(註三二)本來打狗一帶是由萬國本之弟萬國標所防守，此時也已完全交由劉永福負責，劉即用他的義子劉成良帶領黑旗軍駐守於打狗。

在劉永福欲正式接掌打狗防務的時候，打狗駐軍地曾發生一次嚴重的爆炸事件，而這次的軍事意外是因萬國標對軍事疏於管理所造成，於是在劉永福正式接掌打狗之後，趁著懲戒這次意外事件的機會，奏劾有關軍官，懲戒相關人士，對於萬國標留下的怠惰風氣作了一次整頓，也消除了萬國標在打狗的影響力與勢力，這對於接手打狗防務，可說是一個嶄新的開始。(註三三)

雖然劉永福本人仍以臺南府為其駐地，但是他非常重視打狗的防務。一八九五年二月底，臺灣的局勢更加緊張，南部地區的港口與要塞的防備已經更加森嚴與謹慎，而且劉永

福的守軍在此際也日漸增加軍需物資。(註三四)到了三月間，打狗地區與港口要塞已經完全由劉永福的軍隊所駐守。(註三五)面對日本即將進佔的威脅，劉永福在臺南與打狗一帶的防守越加嚴密，他持續地從臺北府運來更多的兵勇與武器，更有粵勇陸續自內陸運達打狗加強防備。(註三六)

臺灣民主國在臺北成立前後，臺灣的守備狀況分為北中南三部分，所擁有及配置的軍力，若只就其中的正規軍而言，全臺兵力共有一百五十餘營，兵員約達四至五萬人之間。(註三七)至於劉永福可以掌握的軍力，就一般記載並無法估計當時防守於南臺灣的全部軍隊數目，因為當時除了正規軍之外，還有許多民兵，也就是義勇或鄉勇。有時這些民兵對於敵人的殺傷力甚至比正規軍還大，(註三八)但是這些民兵來源複雜，戰則為軍，平時則為民，好處是大部分民軍不用給薪或偶爾給薪，武器糧餉多讓其各自籌辦，壞處則是素質差、不易控制，人數之多寡當亦不易正確統計。

據《日清戰史》記載，在五月底左右，唐景崧仍領導臺北的民主國之時，當時的南路防備是由劉永福負責，擁有步兵四十一營，砲兵四隊，概有一萬五千人，再加上後來新募得的民兵二十四營，共計六十五營左右，兵員應有二萬人以上。(註三九)至於南臺灣民主國成立之後，根據《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記載，九月下旬，日軍的勢力已經推展到彰化，此時劉永福能持守的地區是以臺南為主，嘉義一帶與鳳山地區也分別有軍隊駐守，(註四〇)此時就只在臺南的兵員而論，臺南城有十營，安平六營，合其他近旁地區則共有二十餘營，總數概有一萬餘員。(註四一)這便符合《日清戰史》的記載：在南臺灣民主國的所能控制的範圍內，嘉



義駐兵十二營，「臺南安平二十二營」，鳳山五營，旂後九營且另有炮兵兩百名。(註四二)再根據英國官方九月的臺灣情況報告書，則估計南臺灣可用軍力的人數預估在二萬至八萬之間。(註四三)是以，當時南臺灣民主國可用軍力至少有一兩萬人。其間在劉永福控制下且經過訓練的軍隊大概有六千人，其中包括三千五百名的廣東軍與他的護衛軍兩千多人。(註四四)

## (二) 抗日軍素質低劣

劉永福以南臺灣為其防務要地，對於南臺灣的防務相當的用心，然而他的用心並不能抵擋客觀環境所帶來的侷限，而其中之一便是兵員素質的低劣，與軍紀敗壞的問題。

臺灣的軍隊素質不佳、軍紀不振由來已久，即使在一八九四年中日關係緊張而加強防備臺灣之後，依然無法改變這個問題，即如英籍醫生邁爾斯對一八九四年的臺灣軍備情況所做之敘述：

雖然進駐臺灣的軍隊人數眾多，但很快就因為管理不嚴、開小差甚至直接遣散而大批流失，以致實際上只有少數幾個要塞或營地駐軍數量達到其編制的半數以上，剩餘名額的軍餉則被軍官們侵吞了……爲了弄到錢，以通過不正常的渠道購買更多的鴉片和食物，士兵們不惜互相搶劫甚至互相殘殺。如果臺灣不得不靠這些士兵來保衛的話，那麼攻克他將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就連他們能否組織起名符其實的抵抗都是個疑問。(註四五)

問題無法改善，軍隊戰鬥力當然無法提升，在加強臺灣防備的過程中，便只能以徵募更多的士兵爲主要加強軍備之方法。即如一八九五年的二月間，唐景崧在得到一份日本即將攻

臺的密電之後，也只能馬上上奏要求再徵調兵力以應付臺灣的危局。(註四六)然而，軍隊一再徵召，數目一再地擴大，兵員需求數量一多，兵員的來源與素質就更不好掌握，軍隊數量一龐大，且在來不及訓練的情況之下，軍隊秩序的維持也會成爲問題，而在當時，臺灣便面臨著這兩種情況。

在局勢日益艱困危險的情況下，一再地徵兵，一艘艘的輪船運著自內陸徵募而來的兵員及軍火到臺灣來，(註四七)同時也以義勇團練的方式招募臺灣人爲兵員。當時從內地招募到臺灣的清國軍，來源以廣東、汕頭、湖南爲多。(註四八)就以廣東兵爲例，當時登記前來臺灣的士兵多是在當地無所事事且無以爲生之人，其中不乏無賴、流氓、盜賊之輩，他們從大陸來到臺灣，目的當然不是爲了抗日，而是爲了金錢。(註四九)所以爲了鼓勵這些並無鬥志的士兵，遂以十分誘人的條件獎賞對抗日本軍的行爲，於是在兵營附近到處可見這般的告示：

生擒日本軍官或將軍可得賞銀六百兩，殺死則得五百兩；生擒日本兵則得賞銀一百五十兩，殺死則得一百兩；至於擄軍艦一艘，大者甚至可得賞銀七萬兩；擊沉運兵船也可得八百兩的賞銀。(註五〇)

企圖以高獎賞吸引更多投入軍隊且提高鬥志。於是很快地，軍營不缺士兵，但卻缺乏紀律。尤其在以一八九五年二月至三月間，「廣勇陸續至，喧擾無紀律，不可統馭」，(註五一)這般的結果，當然導致臺灣的兵事情況越來越壞。到了四月間，這些廣勇甚至已不好受政府控制，搶劫叛亂的事時有所聞。這批難以統馭的兵勇對於人民，尤其是有錢人而言，可以說是一種至大的威脅，(註五二)然而，爲增加兵員以加



強軍備，這種情況也只任其發展。就如唐景崧於申請再募集兵力的奏文當中曾急切言道：「請敕下號召海內豪傑；無論海寇、馬賊，有能奪回失地一處者，予以賞爵，世守其土。」（註五三）且曾命粵人楊永年赴粵募集「海盜亡命」者千人到臺灣。（註五四）當然，就如廣東兵勇的問題一般，自其他地方卻也同是爲了利益而大量來臺的清軍，其素質亦是難以控馭的。

除了來自內陸的清軍之外，爲了加強防備，臺灣本地則以徵義軍組民團的方式籌備軍力。日本即將佔領臺灣的傳言，使得臺灣社會人心惶惶，有條件內渡的人，已開始進行著內渡的工作，有錢人也著手安置自己的家產，而無力內渡又害怕日本人統治的一般人呢？許多人就在這個時候應徵招募。不過當時爲求大量兵員，於是也以利誘之，所以其中因爲軍餉的提供與獎賞的優厚條件而加入軍隊的，實也不乏地痞流氓之輩，無業遊民及乞丐也都紛紛加入。戴維遜對於當時募兵草率情況的記載，可說是栩栩如生：

有許多招兵站設在市街熱鬧之處，只要是身體強壯的男子都可報名，錄取後，就可以有一支槍。我曾數次親眼見到此種招募的情形。招兵站通常有一張桌子和三把椅子，招兵官坐中央，兩旁是書記。招兵官宣傳演講著當兵的光榮，且言薪水優沃且工作簡單，又常有重賞。演說中時時引起民眾哈哈大笑，很像街頭賣藥的場景。偶爾有民眾受演說者的口才雄辯影響，想走向前去，但其將信將疑且怕民眾嘲笑，遂無法肯定自己的決定。不過一旦決定，即可走向前去，站在桌子前，招兵人員問他幾個問題，若可以則給一塊木牌，叫他們站到桌子後面

等待，以後則將這些人派到各駐地的軍隊去。（註五五）

招兵買馬的情況可以說是非常的不慎重，當然「海寇馬賊」因加入亦非不可能之事。視兵員數的增加爲軍力的增長，如此極盡所能地增加兵員，造成龐大的軍隊素質良莠不齊的情況，也因此在日本未及入侵之時，這批日漸龐大的兵員卻已成爲社會危機。這些新徵募而來的兵員在駐守臺灣之時，因爲紀律不佳而發生了許多狀況，不僅是臺灣社會的亂源，對於在臺灣的外國人而言也是相當的壓力。四月中旬因爲軍隊人數大增，上級不容易控制，於是紛亂的現象已逐漸呈現，五月以後，更是處處有暴動，尤其是臺灣北部，不論城市或鄉下，到處可見士兵欺侮百姓且騷擾外國居民，搶劫時時發生。（註五六）唐景崧對於這種情況也無可奈何，不得不承認他也無法有效管束軍人。（註五七）

### （三）「黑旗軍」已不如昔日

臺灣在面臨日軍即將佔領的危機時，以增加兵員的方式做防備，然而卻因爲兵員素質的良莠不齊，徒然爲社會帶來亂象。這是當時普遍的現象，劉永福所率領的軍隊一般稱之爲黑旗軍，且多是由粵人組成，當然也存在著如上的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劉永福所率領的軍隊雖然號稱是黑旗軍，然而，黑旗之名，不過是因應劉永福而來，這批所謂的黑旗軍，素質也是相當的參差不齊。就如前所言，當劉永福被派至臺灣幫辦防務之時，他所帶到臺灣的黑旗軍已非昔日黑旗舊部，因爲隨他抵臺的黑旗軍舊部只有不到三營，其餘乃是臨時徵募，且在他抵臺前臨時追加的兵員，在沒有經過訓練的情形之下就抵達臺灣，如此，若要要求在臺灣的黑旗軍有昔日在越南的表現，實屬難能，更何況昔日黑旗軍在



越南的成就，也有名甚於實的情況。後來劉永福再從粵新募四營兵員，這一批在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抵達臺灣的粵軍，當然亦有著相同的情況。

就在唐景崧建議劉永福的軍隊應該再加強防守於鳳山恆春一帶之時，劉永福即於一八九五年二月十日率領兩千名左右的兵員抵達打狗。這些人當中大部分是屬所謂的黑旗軍，然而就前所言，黑旗之名不過因應劉永福而來，此時黑旗軍的實力，實在是值得懷疑的。（註五八）更何況其中也混雜著少數的蠻橫份子，因此當時駐臺灣的英國領事胡力穡對於這一批駐守打狗的軍隊有著相當的不安，結果果然不出所料，這一批胡力穡認為沒有經過嚴格訓練且缺乏紀律的軍隊，在抵達打狗之後馬上就引發事端帶來麻煩，首要者為「安平號事件」。（註五九）安平號事件主要是由黑旗軍引起，卻因此導致英商對中國當局的不滿，英商因此以強硬的方式抵制中國當局，英商的強硬態度，卻引起駐紮在打狗領事館附近黑旗軍更不滿的情緒，致使這些士兵有著強烈的反外情結。可以說，在黑旗軍駐打狗之初，就引發中外雙方的緊張關係。

當這批新抵打狗的黑旗軍駐守於打狗各要塞之時，對平民百姓而言也是一種威脅。就旗後而言，旗后街上便常常有攜帶毛瑟槍和雷明槍的黑旗軍四處遊蕩，因為這批黑旗軍的指揮總部遠在七哩之外，所以這些黑旗軍可以說是不受管制而散漫無紀律可言。街上到處可見人民與軍人發生衝突，即使外國人也不能倖免於難。這般混亂的情形致使英領事胡力穡感到不安，故而要求英國當局採取立即的措施，以提供在臺灣的英國人民較完善的保護，德國等駐外領事，為求僑民的平安，亦提出保護方案。（註六〇）黑旗軍軍紀的不佳，對

人民尤其是外籍人士的騷擾，讓打狗成為對婦女而言是不安全的居所，男人其實也不能免於難，甚至英領事胡力穡本人也受過黑旗軍不禮貌的對待。（註六一）一再發生的騷動，使居住在南臺灣的西洋人相當的戒慎恐懼。（註六二）

黑旗軍在一八九五年二月及三月初抵達打狗之際，確實因為軍紀敗壞帶來許多問題，到了四月份，情況仍無法完全控制，致使英國領事胡力穡向劉永福提出強烈的抗議與建議，除了希望劉永福能承認許多的暴動確實是由士兵所引起，更希望劉永福能嚴格處理相關事件，控制軍隊秩序。（註六三）五月以後，黑旗軍的情況已較之前穩定，然而英國方面仍無法信任劉永福與黑旗軍可以維持南臺灣的秩序，即使在六月下旬，由劉永福所領導的臺灣民主國政權已經確立，英國方面仍堅持由他們派軍隊駐紮當地以保護外僑的生命財產安全。（註六四）其實英國的考量不無道理，黑旗軍的紀律確實不佳，暴亂頻頻，而這種情況的真正改善要在位於臺南的臺灣民主國政權確立及運作之後，而其間，劉永福有效的管理與軍事才能是一重要因素。

關於此，當然要注意的便是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的治軍態度確實有他獨到之處。戴維遜即曾稱讚劉永福治軍甚嚴，且能盡其所能地按時發給薪餉，公平公正地將衣著糧食發給麾下軍隊，再加上劉永福本身廉正忠義的形象與態度，很能得到麾下軍人甚或一般人民的擁戴及信任。（註六五）所以即使是在臺南的民主國政權尚未確立之前，將南部的情况與同時期的臺灣各地到處可見盜匪頻頻劫掠財物的情况相比，南臺灣一帶的秩序已算是穩定。（註六六）

是以，從當時的大環境，我們了解到臺灣當時的兵員問



題，也知道當時駐守南臺灣的黑旗軍也有著同樣的問題。不過，位在南部的臺灣民主國正式運作之後，黑旗軍也漸上軌道，因此，若將劉永福治下的黑旗軍與當時同樣駐守於臺灣各地的駐軍相較，黑旗軍確有特殊之處。

此外，其實當時朝野內外甚至國外，都對黑旗軍另眼看待。就清廷而言，其相信有著抗法英名的黑旗軍英勇如昔，企圖藉由他們爭回臺灣。(註六七)對臺灣紳民而言，臺灣人也相信著劉永福與黑旗軍的英名，故在北部的民主國潰敗之後，劉永福的南部民主國政權成了紳民的精神寄託，對於黑旗軍且傳佈著許多英勇殺敵的偉大事蹟。(註六八)日本人當然也引以為患，外國人士亦對於劉永福與黑旗軍也曾給予較高的評價。(註六九)雖然普遍而言，整個臺灣的抗日軍隊的素質不良，黑旗軍的英勇也名過其實。但無可否認地，黑旗軍確實在劉永福駐守南臺灣之際，發揮了安定與保衛南部臺灣民主國的功用，這是劉永福得以據守四個多月的因素之一。

### 三、財政情況與籌款措施

#### (一) 財政的困境

臺灣民主國的成立，最令其困頓的，當是從一開始便嚴重不足的糧餉問題。糧餉不足便無法維持軍隊的養護及政府的運作，「守」勢已難能，何以言「攻」勢？甚至在劉永福決定不再堅守之際，財源已乏，但解散軍隊應得發給遣散或安頓之資，否則可能造成動盪局勢，所以即使他想解散軍隊與政府，在大局考量之下，實有他的困難。

對在南部的臺灣民主國而言，糧餉的不足可以說是導致

潰敗的重要因素，我們可就當時臺灣的財務狀況瞭解一二。不過，兵馬倥傯時期，財務的總數實不易全然正確地考證，但就文獻所留的資料可稍瞭解一概况。就當時臺灣而言，全臺的財務情況概如下：

全臺歲入正雜各款三百數十萬兩。至是，諸款雖減，應納丁糧除外，屬留募防勇外，亦可解十之六。庫存銀約六十餘萬兩，奉部撥接濟款五十萬兩，南洋大臣張之洞密為代陳餉絀情形，荷蒙濟餉百萬兩，電飭南洋於貨洋款下劃解，由蘇松太道，交滬上臺運局試用道賴鶴年手收。此外息借民款，全臺約二十餘萬兩。(註七〇)

臺北是為首府，財務充足，可以說是全臺資源的集中地，但在唐景崧內渡之後，臺灣民主國在北部的政權潰敗，這個可用資源冠於全臺，也是餉械最為充足的首要之都淪為日本所有，造成「軍儲、電線、鐵路、機器局及茶、糖、鹽、礦、樟腦、茄、沉香與金、煤諸礦大利皆在臺北，遂舉為倭有」的情況，(註七一)尤其臺北有臺灣唯一設備精良的軍械製造局，一旦陷落，不僅臺灣其他地方無由取得新的器械，反而更增日本的資源，原本南北可互相支援的局勢不再，就南臺灣而言，損失不可謂不大。至於臺中，在黎景崧到任之際，所儲庫銀最多只七千餘兩，(註七二)加以抄封官田數萬畝所得地稅項三萬餘兩，當時仍可被利用者只萬餘兩，紳商籌款則只杯水車薪，故可知當時臺中部份，全部可用款項概只兩萬餘兩，兵餉確實不敷使用。而當時臺南府的情況，據思痛子記載：

自五月以前，道庫存銀約七萬餘兩，府庫約九萬餘兩，臺南支應局約萬餘兩；永福接手，清查庫儲，惟道庫未



動，府庫及支應局共約存銀六萬餘兩。(註七三)  
總而論之，劉永福初期據守臺南之際，臺南府庫只有庫銀十三萬兩，較之於臺北情況即可知其困乏。

在這樣的情況下，劉永福在南部撐起臺灣民主國的局面，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當然是糧餉的不足，他所必然進行的工作便是籌措餉糧。在臺南的政局正式成立之時，劉永福即要求人民「有銀幫銀，有錢幫錢，無錢幫米，無論多少均善」(註七四)且與安平知縣忠滿等集紳商會議，自南部紳商處籌集資金。(註七五)然而，卻導致許多有錢人與大財主爲了逃避劉永福對款項的一再要求而內渡，所以自富有者處募集資金的成效並不大。(註七六)由老百姓處收取必要款項的方面，除了平時的地稅與其他稅款之外，且向人民依財產的多少課以戰爭稅。(註七七)

另外，劉永福繼續維持海關的運作，以持續關稅收入及安定商業貿易。海關收入且多爲劉永福所用，劉永福十分重視，甚而視之爲提供臺南政局及戰費的重要來源。(註七八)不過海關之所以得以繼續運作，實是劉永福相當勉力才得以維持。

也就在南臺灣民主國成立之際，臺南關的代理稅務司史賓尼(W.F. Spiney)與海關職員在六月二十九日結束海關的所有工作，打算放棄海關職守而離開安平。(註七九)劉永福得知消息之後非常生氣，絲毫不顧稅務司與英國領事的權責並不相關，卻要求英國領事胡力穡無論如何要將整個海關維持下來，若無法留下原來的官員，至少要保證找到一批可以維持海關繼續經營的人員。爲了維持中立的立場，胡力穡拒絕介入此項事件，情急之下，劉永福恰得知海關職員在撤退

之時，因爲意外而使其中一艘船艦未能及時離港，劉遂要求因乘此艦而尚留在安平的英人麥嘉林(Messrs MacCallum)繼續留下經營海關。經過三個小時的長談，麥嘉林答應接受稅務司一職。麥嘉林乃前任代理稅務司史賓尼的部下，所以十分熟悉海關職務。與麥嘉林同乘一艘船艦的尚有兩位中國海關人員陳鑾、蕭祥彬(兩位皆爲廣東人)，也繼續留下來，而這兩個人更是嫺熟於海關事務，(註八〇)英國人伯頓(S. Burton)也被留下來爲麥嘉林的助手。於是，很快地，臺灣民主國所屬的海關在七月四日又開始運作。(註八一)

雖然麥嘉林的稅務司一職並非由史賓尼委托，更非由總稅務司正式任命，而是由清廷與日本在政權交換之際的反對政權所聘任，若就清朝或日本而言，麥嘉林並無正當資格。(註八二)然而麥嘉林所帶領的海關卻給予臺灣民主國相當的幫助，不僅助以穩定貿易，每月繳給劉永福政權的關稅概有一萬三、四千兩之多。(註八三)建立郵政制度獲取利潤也是在麥嘉林的建議下始施行，即使是非正式海關機構，卻給臺灣民主國以正常之海關的方便與好處。是以，在財政相當吃緊的情況下，劉永福仍給予海關職員相當優厚的待遇，由此更可見其對海關收入的需要與依賴。對於海關人員的管理與表現，劉永福可說是滿意極了。(註八四)

劉永福亦相當注重臺灣的對外貿易，從貿易當中賺取外匯增補軍費的不足。(註八五)於是，即使整個民主國的情況並不穩妥，劉永福也盡量維持著對外貿易的穩定，鴉片繼續輸入，樟腦仍持續輸出。這也是在臺官紳所有的共識，尤其自從五月一日發生在他里霧的搶劫外商事件之後，官方便盡力想控制使之不再發生，以免引起外國的反感。於是在臺灣



民主國的政權下，對外貿易非常平靜且自由地持續著，相較於當時的亂局，可說是非常奇異的現象。（註八六）當然這是劉永福刻意維持的局面，一方面為持續外匯收入，一方面也以持續貿易的方式安撫外國勢力。

八月間可以說是臺灣民主國青黃不接糧餉盡罄的時候。

（註八七）自七月以來，劉永福對張之洞的一再求援，其間曾多次派員到內地，易順鼎與劉永福幕僚吳質卿與羅綺章等都曾求助於東南沿海一帶的官員，卻從沒得到過允諾：「中北路約期俱舉，而臺南餉械兩絕。永福又命吳桐林渡廈乞助，遍走沿海，無一應者」；「咸束手無策。而前敵乞援急……再令幕僚羅綺章渡廈，籲援各省，辭甚哀痛」。（註八八）到了八月之際，也已明白張之洞的援助已無可能。求援不成，局勢當是更加危急。劉永福與民主國官員也為籌餉事而夜不成寐。（註八九）所以當前的問題便是再開闢財源，於是，另一項籌措款項的措施便開始施行，那就是設官票局發行紙幣，以及設郵政局發行郵票。

## （二）解決財務困境的措施

為解決資金問題，在外商公司擔任買辦的莊序端建議設立官銀錢票局於臺南府，所謂官銀錢票局即類似於銀行的機構，可由之發行紙幣吸納資金。（註九〇）據戴維遜記載其實行的情況：

政府過去一、二個月的支出都是使用官銀票，並宣告海關、商人及所有人當銀支取，首先發行官銀票是以洋人關行作為擔保（臺南府正忠堂）。當初這些官銀票可以照現銀通行通用，但近一、二星期兌換停止，於是又另外發行類似之官銀票，是由臺南府內的有錢人作為擔保

（臺南官銀票總局），另外又發行投機性的彩票（臺灣民主國安全公司股份票），承諾當日本人被驅走後，和平來臨，民主國重建時，一元之彩票可以換成四元。（註九一）

臺灣民主國是為籌款項而發行官銀票，故官銀票局隸屬於籌防局管轄。先由「護理臺南府正堂忠」於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一（六月十日）日始發行官銀票，但只流通一、兩星期，便再改由莊序端主持的「臺南官銀錢票總局」於八月十九（六月二十九日）再發行，發行過數次，流通時間較長，一般所談的官銀票所指為此。而兩次發行的官銀票除了可憑票流通之外亦可憑票兌錢。（註九二）官銀票以「一份三聯」的形式發行，一聯存於知府，一聯存於官銀票局中，再一聯則為流通之用，「票長九寸二分，闊五寸二分，上列號數及年月日，鈴蓋臺灣總兵、臺南知府及辦理全臺防務總局之印，又有民主國之章」。（註九三）

官銀票局曾試圖在福州、上海、廣東與廈門建立分公司，讓士兵的家屬可以在這些分公司憑票提領士兵服役於臺灣的薪水。（註九四）其實這是因為在臺灣發不出足夠的銀兩給士兵以為薪餉而有的變通之計，是以軍用性質多些。對於臺灣而言，發行官銀票是絕無僅有的事情，不過即使試圖使之行之於內地，但事實上流通範圍還是以民主國所在的臺南地方為主。（註九五）再有一種是「臺灣民主國安全公司股份票」，是類似於公債的東西，且承諾在臺灣局勢大定之後，政府將以四倍於彩票面額的價值買回彩票。（註九六）發行期間概是在財政處境更為困難的九月之後。（註九七）

起初這些官銀票發行於七月下旬，市面上仍甚流通，但



是一方面，這些官銀票都是在沒有充足銀元為發行準備的情況之下發行，根基根本不穩；再方面因戰事日非，人心動搖，臺灣豪紳富商內渡者越來越多，挾去款項之數對當時已促促的經濟狀況而言，當然有著負面的影響。九月中旬以後，臺灣民主國仍籌不出款項，致使這些「以紙代銀」的制度終不可行，且造成金融失序，「西人銀行及大小商民紛至索銀」，然民主國仍然籌不出足夠銀兩兌票，至九月底已是「商民持票索銀愈急，臥守不去」的情況。（註九八）其實吳質卿早已預言：「如銀票不行，則臺南人心瓦解矣」，（註九九）果然，這些不為人民所信任的紙鈔到後來逐漸貶值而淪為廢紙一般，（註一〇〇）不但影響市場交易更是動盪人心，難怪易順鼎以為，這般的紙鈔制度只是：「以鈔濟銀」，根本就是「苟且之術」。（註一〇一）

不過，官銀票局的成立的確有助民主國的資金籌措，自七月下旬始行到九月下旬之後的不可行，期間大概共發行銀票二十五萬兩，台灣股份票則在五萬兩以下。（註一〇二）

另外，為籌糧餉，海關稅務司麥嘉林建議實行郵政制度。（註一〇三）即如當時清朝之郵政制度掌於海關一般，在麥嘉林的建議下，臺灣的郵政亦由海關辦理，開辦於安平海關。

（註一〇四）連橫以為，此郵政制度的成立是為解決兵馬倥傯時代，臺灣與內陸之間的通信聯絡問題，（註一〇五）但戴維遜以為，此郵政制度不但可以增加政府收入，而且可以透過郵政的管理實行對於老百姓往來臺灣與內陸的書信檢查。（註一〇六）英領事胡力穡則認為郵政制度的施行主要是為了籌措資金。

（註一〇七）吳質卿也記載，他與麥嘉林相商發行郵票是為了籌措款項。（註一〇八）關於這一點，若就郵政制度是由海關稅

務司麥嘉林所建議而執行的一事來看，針對民主國「窮困的經濟情況」而提出解決方式的情況是最為可能的，所以劉永福的本意該是以籌募資金為主。當然，完整的郵政制度當可達到以上所述的這些功能，但是除了安平以外，劉永福在他所統治的其他地區並不強制執行郵政制度。（註一〇九）關於此，這倒是令人費解的事。

郵政的收入來源當以郵票的發行為主。其間，郵票的發行狀況據戴維遜描述：

郵票發行兩次，每次三種，貼第一次所發行的郵票所寄出的書信有九千三百封，第二次則有八千封，皆用為郵政。（註一一〇）

兩次的發行分別在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二十八日，（註一一一）都包括三種面額的郵票，一是三十錢，一是五十錢，一是壹百錢，共有一七三〇〇份的郵票被貼於書信寄出，且透過第三國的輪船運至內地，對於當時兩岸書信的溝通確實有相當的幫助。當時的郵票發行量多於實際被用於郵寄的數量，即售出總額多於實際郵寄的郵票總額，始一發行，便獲利五千餘兩，（註一一二）而郵政制度也一直持續到十月初仍可行。

透過這兩種方法，臺南的政局再籌得款項，但仍然不足，財政的困難到了最後關頭，甚至向人民收取「逃亡稅」，也就是每一位想內渡的人，必須到議院去申請旅行券，而申請旅行券需要花錢，平常人家一戶繳交二兩，有錢人家則需繳交數倍的錢，如果沒有通行券則絕對不許離開台灣。（註一一三）這也就是向內渡的人民依其財產多寡收取稅捐。另外，

劉永福又在港口設有關卡檢查欲乘船內渡者的行李，有的甚至上船檢查，為的是不讓人民帶太多錢財離開臺灣，違者則



沒收，以防止早已匱乏的資源不斷外流。據說道臺陳文騷與安平縣長謝壽昌要離臺之際，他們先行送到安平港口的行李在劉永福的命令之下被黑旗軍打開來檢查，結果被取走五百五十兩。而兩人也在各給予劉永福一筆資金之後，他們所乘坐的德國輪船 *Martor* 號才得以順利啟航。(註二四) 在資金困頓的情況之下，這也是劉永福為臺南政權籌備資金的辦法。不過因為劉永福強行檢查旅客行李的行為確實為船運公司帶來不便，致使船運公司幾次都是針對此事而提出強烈抗議。(註二五)

然而這些稅收就整個局勢而言，可以說只是杯水車薪且緩不濟急，其實當時最需要的，還是內地支援以大筆款項。所以劉永福在臺灣實行這一些經濟措施的同時，仍然一再地向張之洞求糧餉之助，但是張之洞在朝廷下令不准再援臺之後已有所顧忌，加上唐景崧已內渡，對於助臺以餉械一事更是意態闌珊。劉永福對內（臺灣）籌糧餉，但成效不大；對外（內陸）求餉械，亦是無所得，在這般的情形下，臺南的政府又何可支持？八月一過，日軍往南方進展的行動也積極了起來，兵員裝備皆完整的日軍，對劉永福的威脅至大，在此種情況下，九月之間，無糧餉缺軍械的臺南的政權已然動彈不得。

有者對於劉永福不能適時援助臺中的黎景崧，而「坐擁厚兵重餉，恃中路之戰勝而安享承平，亦不給一兵、發一粟」，(註二六) 而嚴厲批評臺中陷落一事。其實所謂的厚兵重餉實只是較之於臺中而言，若就其實際，臺南情況如何得以言此？是故亦有體念及其困局，而也給予同情的肯定者：

臺南援絕糧竭，相持數月，軍皆饑困，日軍以全力攻臺

南……僅餘臺南孤城，永福死守……永福守臺南數月，以糧糈並絕而敗，世猶諒之。(註二七)

援絕糧竭，軍皆饑困，加以日軍以全力攻臺南，糧糈並絕，永福之敗，實可諒之。

#### 四、行政與外交

##### (一) 設立議院且進行籌防

十二天的政府與維持了四個多月的政府，兩者之間的運作及機能當然是有所不同的。其實，就兩個階段的民主國而言，除了其成立的原動力是相同的之外，較之於以唐景崧為主而成立於臺北的台灣民主國，在劉永福主持之下的台灣民主國南部政權，才真正地有所運作且有所效用。

在行政方面，民主國在臺北的政權甫一成立，便有較為完整的政府組織人員之安排，然而不待有機會實行便告瓦解；(註二八) 反之，民主國南部政權之成立，可以說是匆匆地完成。民主國初成立之時，雖擁劉永福為大總統，但劉永福不接受總統名，仍以幫辦自稱，但是實際上的權力還是掌握在劉永福的手裡，而且他的權力非常大，戴維遜直接稱之為民主國的總統，胡力穡甚至還稱劉永福為「民主國的獨裁者」。(註二九)

臺灣民主國也設有議院，以臺南附近的仕紳或富豪擔任。民主國的局面在六月底底定之後，七月八日臺南士紳許南英即向劉永福建議開設議院，劉遂以公告昭示臺灣民主國紳民，宣布民主國議會之成立：

為出示曉諭是事，照得本年閏五月十六日，據紳民許南英面稱，公議不服日，立為民主國，請創議院以通上下之情，並僉舉公正紳耆為議院主等。因查台南為一國之



根本，因時制宜，政務煩雜，苟不衷諸至當何以維國？是而順輿情，故知口不可防，亦由會不可弭。自來庶人工商皆有分議者，此也茲特準派許紳獻琛、徐紳元焯、王紳藍玉三人為議院主議。盧紳振基、陳紳鳴鏘、林紳香山三人為議院參議。並刻發關防，俾昭信守，凡事不拘鉅細，意見各有不同，今擬立官立政，進退人材，因革損，莫不宏開議願，聽眾人公是非，詢謀僉同無偏無倚。一經呈閱，本幫辦當必採擇，次第舉行。諭委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城鄉紳耆軍民等一體知悉。嗣後如有軍國大事，即開議院，任各人到院共議，尊卑不論，期有濟乎時艱。庶事不分，俾有益於政事，毋得各存私見。擅辦囂囂，理本出於公行而無私斷，各宜勉旃，毋負厚望，切切特示！（註一二〇）

臺南議院設立在孔廟北鄰，（註一二一）據資料所載，其間議員人數確定者有六人，分別是主議許獻琛、徐元焯與王藍玉。盧振基、陳鳴鏘及林香山（即林馨山）三人則為議院參議。當然議院人數當不只六人，即如許南英為議會發起人，是否為議員之一卻沒提及。但是若就吳質卿的記載，許南英、陳鳴鏘、盧振基、徐元焯、施獻琛（即許獻琛）等五人為議員，許南英即列名其中。（註一二二）而吳德功則只記載議院中有舉人許獻琛、貢生徐元焯、生員林馨山等人。（註一二三）連橫卻只記載三人：許獻琛、謝鵬羽、陳鳳昌。（註一二四）據以上所記錄的名單，議員的名字有所重疊卻也有所遺漏，是以當時的議員人數並不能完全確定。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議院曾經選出議員七人，以組成專門籌款的執行委員會，（註一二五）由此可知臺灣民主國在臺南的政權，其間議員絕對在七

人以上。

臺灣民主國在臺北的政權，其議院因為民主國的存在時間太短，所以幾乎沒有運作的功效，在臺南的民主國議院則不然，即如劉永福所企盼：「嗣後如有軍國大事，即開議院，任各人到院共議，尊卑不論，期有濟乎時艱。庶事不分，俾有益於政事，毋得各存私見。」是以，議院議員確實有固定時間是必須集會討論的。（註一二六）不過即如藍厚理以為，臺灣民主國的議會，不論是臺北或是臺南，身份、教育及財富都是議員必要的背景，「代表性」強過於「實力」。（註一二七）臺灣民主國在臺南的政權也不例外，真正的主要權力掌握在劉永福手裡，所謂的「軍國大事即開議會」所得到的成效並不大，亦不完全具備西方國家議院的立法功能，（註一二八）反而在資金缺乏的情況之下，議會的功用淪為籌備款項為主，即如前所言，官銀票及郵票的發行都在通過議會討論後被執行；決定人民能否內渡的旅行證是由議院審核發給，當然也是由議院依申請人的貧富而收取費用，當然最直接也最急需的便是這些議院富紳的捐款，以及帶領人民共同捐款的風氣。不過，籌款功效並不大，因為有錢的士紳多想辦法內渡，沒辦法內渡的人民當然沒錢捐款。其實就整體而言，議院的功效也不大，議員的素質不佳，無法取得人民的信服當是主要的原因，易順鼎即曾批評之：

雖開設議院，勸民捐輸，而富民多已內渡或潛匿不出，議院紳士又不免藉公行私、黨同伐異，大失人心。（註一二九）

吳質卿在旁聽多次的議會討論之後也言：「議院紳耆多瑣瑣，恐不為臺灣治化之源。」（註一二〇）對於這種情形，劉永福



卻也只能喟然而歎。

民主國在團練局之外更設有籌防局，是籌備防務的性質。許南英在一八九四年中日開戰之際即被命為臺南的團練局局長，民主國在臺南的政權確立之後，劉永福再任他為「籌防局局長」。(註一三二)籌防局是分段防守分段負責，其間共分爲五段，但統於劉永福。(註一三三)民主國成立，國庫空虛財政困難，故設有「糧臺」籌措資金。當時民主國的資金有賴於地方官紳籌出，陳鳴鏘是臺南富豪，又好聲名，故被舉爲糧臺，以帶動富豪資金的投入。然而效果並不好，被迫繳款的富豪反而爲躲避而紛紛內渡。(註一三三)

## (二) 內治與外交

在臺灣民主國的治理之下，因劉永福治軍甚嚴，且盡量欲維持法治與秩序，所以一直到離臺內渡之前，不僅持續擁有相當的聲望，在他治理南臺灣期間，人民皆頗能信服之。

(註一三四) 尤其是外國人民，對於劉永福的治績更是予以肯定。當時住在臺南的長老教會牧師宋忠堅 (Duncan Ferguson) 就曾誇讚之：

持平地說，劉永福在治理南臺灣的六個月之間，很友善地對待我們外國人，而且也將整個南臺灣治理地非常好。(註一三五)

是以，在劉永福內渡之後，宋忠堅曾向日本人表示，對於劉永福能夠安全逃離臺灣，他們甚感欣慰。(註一三六)同屬長老教會的巴克禮 (Thomas Barclay) 對於劉永福統治下的臺南，亦有同樣肯定的說法：

我很高興臺南並無任何騷動，黑旗軍首領把人民治理得非常好，他也向外國人保證，能如友善地對待且確保他

們的安全。他將海報給傳教士們張貼在教堂外，海報上說明：這些教堂是友善國家所有，不許被打擾及傷害。

(註一三七)

英國領事胡力穡也相當肯定劉永福的管理，至少對於外國人居住地區是如此。當時居住在臺灣民主國境內的外國人以臺南府、安平與打狗爲主要地區，(註一三八)雖然在政權確立之初，胡力穡對於劉永福與黑旗軍是否能確切地維持這些地區外國人居住地的平安與秩序，持相當懷疑的態度，故一度堅持繼續在此地駐兵而與劉永福相持不下，直到劉永福提出極爲強烈的保證，才使胡力穡與當時的英國資深海軍軍官同意撤出英國軍隊。(註一三九)然而在臺灣民主國正式掌管之後，胡力穡對於劉永福的管理逐漸改觀，不僅對於劉永福有相當的支持，在九月底的外交報告書當中更肯定劉永福：

(劉永福)在保持法治與秩序方面有相當的表現，也在軍隊中維持嚴格紀律，即使仍有少數暴亂事件發生，也多是一般盜匪所爲。(而非軍人所爲)。(註一四〇)

而且胡力穡也曾表示，劉永福總是很能尊重他的意見，在許多地方也盡量地表現出開明且紳士的態度，所以他對於劉永福是無可抱怨的。(註一四一)因此他多次聲稱兩人之間保持著令人滿意的關係，(註一四二)相較於四月下旬所言：「我和劉永福之間的關係不令人滿意」(註一四三)確實已完全不同。

若就胡力穡於六月之前與九月底的言論相比較，即可瞭解胡力穡態度與觀感的轉變，更可瞭解劉永福統治臺灣民主國期間所做的努力與其間的成效。不過也就因爲胡力穡與劉永福關係甚佳，在許多方面都贊助劉永福，致使日本方面對於胡力穡相當不滿，謂其性格偏頗處事草率且不知禮儀，甚



至稱之爲「偏頗之代言人」。(註一四四)但也由此可知，具有英國官員身份的胡力穡確實與臺灣民主國的政權有著密切且正面的關係。

對於宋忠堅對劉永福的誇讚，論者以爲那只是表象，並不是每一個外國人都以爲如此，所以不能就此肯定劉永福在臺南的治績。(註一四五)其實這般的懷疑是不需要的，因爲若我們就劉永福的立場而論，他確實不得不善待外國人，確實盡力在做好外交，以維持與外國勢力良好的關係。

即如前所言，民主國的財政匱乏，所以海關稅收與對外貿易的外匯對於民主國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收入，而不論海關的經營或者對外貿易的進行，都仰賴於外國人的幫助，所以在劉永福治理臺灣民主國的期間，他都盡量與外國人保持良好關係，而與外國人保持良好關係的方法，當然是盡量讓在臺南及打狗等地的外國人對劉永福本身或民主國有好印象且有信心，所以保護其安全且維持好社會秩序當然是相當必要的。劉永福極善待海關人員，也相當歡迎外國人繼續來臺貿易，這都是可見的。此外，當時通行於臺灣與內地之間的汽船也爲外商公司所掌握，爲了保持與內地的聯繫，劉永福當然深怕這一連線的喪失，針對於此，他當然也不想得罪這些外國人。再者，即如前所言，劉永福之所以留守臺灣，與張之洞有相當的關係，也就是他如張之洞一樣，相信臺灣的轉機在於第三國勢力的介入，他之所以留守臺灣便是爲了等待此一轉機。所以轉機關鍵所在的第三國勢力絕對是他必需維持好關係甚至取得其信任與同情者。(註一四六)

就此而言，不論他的動機與立場爲何，可以肯定的是，劉永福確實用心在經營與外國勢力的關係，當然有其私心動機

在，但是爲了維持這層關係，外國人居留地的秩序與整個社會的法治是維持得很好的。在臺灣民主國位在臺南的政權潰敗之後，時論即曾評之：

數月以來臺南之民爲軍門約束，頗見安堵；雖有日兵至臺南開仗，其民情之安靜，亦與臺地未割以前無殊。皆軍門之善於約束也。(註一四七)

軍門即是劉永福。確實給劉永福治下的臺灣民主國以相當的肯定。

## 五、結論

在臺灣被割讓給日本之後，臺灣人民如火如荼地展開抗日運動，臺灣民主國成立於臺北，是一先聲，卻在成立背景及條件皆有所侷限及侷促的情況下，短短幾天便告結束。就在此時，臺灣民主國在臺南的政權被確立了，其精神與背景皆相同於原來在臺北的民主國政權，但客觀條件卻完全比不上。

臺灣民主國在臺南的政權維持了四個多月，政權的維持十分不易，餉械之匱乏尤爲問題之一，籌備糧餉遂成了政權維持的主要問題。臺灣民主國的籌款方式除了自島內籌得，便是向內地募集；而前者即是在臺收稅與向紳商募款，或藉由過渡政權之臨時海關的維持，繼續對外貿易且從中獲利；後者即是七、八月間劉永福不曾稍停地向張之洞要求的援助。前者收入緩不濟急，且效果不彰；後者則頻頻遭到張之洞的拒絕。在困難的情況下，臺灣民主國開始推展兩項新政，一是成立郵政制度，一是成立官銀票局，寄望由兩項新政的推行，使緊迫的財政狀況得一紓解。在劉永福的努力之下，臺南雖然餉械皆匱乏，卻仍能維持相當好的法治與秩序，不僅深爲居住在南臺灣的外



國人的肯定，同時也為南臺灣的人民帶來較為穩定且安全的生活，當然提供當時全臺灣人民持續抗日的一種精神標竿。

然而，在此層的肯定下，我們仍須瞭解臺灣民主國的成立背景只是「守而待援」，待民主國的領導者劉永福一旦瞭解到，從中國方面來的援助是不可能之時，堅守便不再有意義，於是，撤退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是以，即使臺灣民主國的許多政策仍尚稱有規模，統治情況亦稱良好，在所等待的轉機不再，日本的佔領行動又強力展開的同時，臺灣民主國的解散，便成了事所必然之事。不過，即使僅只維持了短短的四個多月，卻甚有意義，實是當時臺灣人奮力抵抗外族統治之精神，所不可抹煞的一頁。

# 【註釋】

註一：梁華璜，〈甲午戰爭前日本吞臺灣的醞釀及其動機〉，《臺灣文獻》二六·二（一九七五），P104～105

註二：劉永福（1837～1916AD），字淵亭，先世居於廣西鬱林州博白縣（鬱林州乃屬直隸州，直接隸屬廣西道）。道光年間會黨往來於廣西廣東一帶，鬱林一州尤為然。劉父以來以農為業，因生計日難遂離開博白，遷往廣東廉州府欽州，盜賊亦頻繁出沒此地。劉遷居至此，娶鄰村村婦為妻，於一八三七年十月十日（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生永福。道光年間，家貧無以為繼，再遷回廣西南寧府上思州。道光末年太平軍盛行於廣東廣西一帶，天地會亦倡行其間，永福時年二十一，因無以為生遂投軍入會黨，始展開其軍旅生涯。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臺北：正中書局印行 無載出版日期

）；李健兒，《劉永福傳》（臺北：臺灣商務 無載出版日期）；趙爾巽等，《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一九八一）卷463〈列傳250·唐景崧 劉永福〉，P12733～12738

註三：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Record (Microfilm) ·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 · China · Correspondence · (Taiwan) · (以下簡稱FO) 228/1199 · Tainan 30 · May · 1895 · Hurst to O Connor · P188～189

註四：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東京：刀江書院，一九六五年印行），P971

註五：Harry J Lamley 以為，因為劉永福能適時行動，掌握了時機，所以能在北臺灣民主國潰敗之際，馬上掌握了南部的權力，成為南部的最高軍事司令。Harry J Lamley 著 吳密察、蔡志祥譯，〈一八九五年之臺灣民主國——近代中國史上一段意味深遠的插曲〉，收錄於黃富三編《臺灣史論叢》第一輯，（臺北：衆文圖書，一九八〇），P300

註六：關於臺南府重要官員離臺內渡的日期，有不同的記載：思痛子只記載以上四人在是農曆五月割臺議事確定之後內渡，而割臺事定，所指概是六月二日李經方與日本在海上完成的交割事宜，見思痛子，《臺海思慟錄》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七），P16。胡傳則於農曆五月二十四日記載是此四人將於隔日（農曆五月二十五日，即西歷六月十七日）乘思美號離臺，但不知是否當日確行，見《臺灣日記與稟啓》收錄於沈雲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五輯（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八一），P256。吳德功則記載陳文騷與朱和鈞概於六月二十九日左右離臺，而萬國本則於七月十八日，見《讓臺記》，收錄於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割臺三記》，（臺北：臺



灣大通書局，一九八七），P50、52。FO 228/1199，Tainan 14，June，1895，Hurst to O Connor，中則言，六月十二日中午，許多重要的清朝官員皆乘德國船艦 Marter 離台，其中陳文騷與朱和鈞則在此時。P299～300。就資料所記載，台灣割讓之際，局勢混亂，要確知各人內渡的正確日期，實屬難能，而仍有斟酌的空間。

註七：FO 228/1199，Tainan 14，June，1895，Hurst to O Connor，中提到，重要清官的內渡，留給了劉永福不受抑制的權力，P300；思痛子與吳德功皆言，當陳文騷與萬國本離台之際，確實將印信交給永福。此亦可見於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P246

註八：臺南團練局局長為臺南仕紳許南英，在劉永福到臺南掌大局之時，許南英仍是團練局局長，且是後來劉永福所辦的籌防局局長，是故，民兵的實際掌權者是許南英，不過許南英必須對劉永福負責。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P246；前島信次，〈巴克禮と宋忠堅——臺南府恐怖の一日〉，收錄於《臺灣時報》（昭和十一年五月），P119；許贊堃，〈窺園先生傳〉，收錄於許南英《窺園留草》（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二），P236

註九：〈鎮守臺南幫辦軍務劉淵亭軍門致臺民抗日布告〉，收錄於黃富三、曹永和主編《臺灣史論叢》第一輯，P325

註一〇：〈劉永福與臺灣人民的抗日盟約〉，收錄於黃富三、曹永和主編《臺灣史論叢》第一輯，P326～329

註一一：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P230

註一二：吳質卿，〈臺灣戰爭記〉，《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P102

註一三：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二），P9

註一四：FO 228/1199，Hurst，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Sep，1895，P379 James W.

註一五：Davidson，*The Island of Formosa——Past And Present*，P315

註一六：大田才次郎，〈論說近衛師團的功蹟〉，收錄於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第三編（臺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原東京：東陽堂發行《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P208～209

註一七：大田才次郎，〈論說近衛師團的功蹟〉，收錄於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第三編，P208

註一八：《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〇），卷十五 一二二一〈軍機處電寄李瀚章諭旨〉（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一二二二〈軍機處電寄譚鍾麟諭旨〉（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註一九：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P237

註二〇：邵友濂以為基隆滬尾是北部最重要的港口，由淮軍宿將楊岐珍統領即可，但是南部情況卻是：臺南軍力單薄，恆春為日人早先覬覦之地，澎湖地理位置至為重要，所以如果能讓劉永福直接到南部駐守，則策應澎湖就更為方便。FO 228/1164，Tainan 7，Sep，1894，Hurst to O Connor，P201；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P237；《清季外交史料》，卷九五〈臺撫邵友濂致樞垣報臺境布防並策應澎湖電〉（光緒二十年八月一日）

註二一：FO 228/1164，Tainan 7，Sep，1894，Hurst to O Connor，P201

註二二：FO 228/1199，Hurst，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the Quarter ended 31 Dec，1894，P41

註二三：邁爾斯致歐格納函，附〈臺灣情況備忘錄〉一八九四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英國外交文件》收錄於戚其章主編《中日戰爭》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P644

註二四：《英國外交文件》收錄於戚其章主編《中日戰爭》第十一冊，P644～645

註二五：當時台灣鎮總兵萬國本也同駐台南城，導致劉永福在台南的情況是「名為幫辦，實則無法號令」，於是要求與萬國本分地防守。劉本身南移鳳山旂后，被命專防旂后至鳳山、恆春一帶，而萬國本則專防安平至旂后一帶，兩人畫分勢力範圍。戚其章，《中日甲午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P561；思痛子，《台海思慟錄》，P15

註二六：思痛子，《台海思慟錄》，P15

註二七：先是一八九四年十月的長征日本長崎之議，再是一八九四年十二月東南沿海之緊張局勢，然後是一八九五年二月的東北之危，即三次欲藉機將劉永福調離台灣。一方面當然是希冀永福的抗法英名可對危急情勢有所助益，然而不可否認唐景崧對劉永福的排擠，《清季外交史料》，卷九七〈旨寄邵友濂詢劉永福能否率偏師直搗長崎電〉（光緒二十年九月八日）：王樹枏編，《張文襄公全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輯（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三），卷一四〇電牘一九〇〈致台北唐撫台〉（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辰刻），卷一四〇電牘一九〇〈唐撫台來電〉（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亥刻），卷一四二電牘一一一〈致萊州李撫台、丁鎮台〉（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子刻）

註二八：一八九四年十月間本欲將劉調往北部，直搗長崎，劉永福便以兵力不足且未經訓練為由，拒絕北上。此次事件雖中止，卻讓劉永福得有機會派員回粵添募數營軍力。《清季外交史料》，卷九七〈旨寄邵友濂詢劉永福能否率偏師直搗長崎電〉（光緒二十年九月八日）

註二九：劉永福自言：「慣用粵人，難帶他勇」。《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一〈台灣巡撫來電〉（光緒二十年九月十一日）

註三〇：FO 228/1199 · Tainan 15 · Jan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46

註三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五〈台撫唐景崧致軍務處日議犯京攻台請遷幸熱河電〉（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註三二：FO 228/1199 · Tainan 16 · Feb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61

註三三：在劉永福與萬國標交接打狗駐防地之際，二月一日的下午二點，發生火藥庫大爆炸的事件，且造成相當大的損失，尤其這個時候是萬國標與劉永福軍事交接之際，所以駐防地的士兵比一般的時候都多，造成的兵員死傷慘重的情况，一般人家的房屋也或多或少有所損失。FO 228/1199 · Tainan 6 · Feb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52～55 · 戴維遜即以爲，爆炸之發生是因爲萬國標平時對軍器器械管理並不嚴謹，士兵常在火藥庫內徘徊抽煙而引起。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台北：南天書局影本，1992) · P346

註三四：FO 228/1199 · Tainan 28 · Feb · 1895 · Hurst to Rattler 艦的艦長 · P79

註三五：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1 · March · 1895 · P112

註三六：FO 228/1199 · Tainan 23 · May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180 ·

註三七：當時在台兵力到底多少，王世慶整理出多種說法，筆者以爲有四至五萬人之譜。參考王世慶，〈乙未割台與日本遣送清文武官兵始末〉，《台灣風物》三八·一一（一九八八·



六) · P9 ~ 16

註三八：許佩賢譯《攻臺戰紀一日清戰史·臺灣篇》，(臺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原日本參謀部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P372

註三九：許佩賢譯《攻臺戰紀一日清戰史·臺灣篇》，P370 ~ 371

註四〇：《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上冊，(臺北：捷幼出版社，一九九一影本)，P118

註四一：《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上冊，P122

註四二：許佩賢譯《攻臺戰紀一日清戰史·臺灣篇》，附錄九〈嘉義、鳳山間敵軍兵力〉，P420

註四三：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7

註四四：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6 ~ 387

註四五：邁爾斯致歐格納函，附〈臺灣情況備忘錄〉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七日，《英國外交文件》收錄於《中日戰爭》第十一冊 P643 ~ 644

註四六：《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五〈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日議犯京攻臺請遷幸熱河電〉(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註四七：思痛子，《臺海思慟錄》，P2 ~ 4

註四八：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264

註四九：喜安幸夫，《臺灣抗日秘史》(臺北：武陵出版社，一九九七)，P13 · 33

註五〇：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264

註五一：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收錄於《臺海思慟錄》，P46

註五二：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269 ~ 270

註五三：《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五〈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日議犯京攻臺請遷幸熱河電〉(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註五四：思痛子，《臺海思慟錄》，P3

註五五：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269

註五六：到了五月，臺灣北部幾乎每天都有暴亂的消息傳出，不僅城市如此鄉下也有，駐紮當地的軍隊闖入民宅，或偷或搶，對百姓造成相當的困擾。這般亂象幾乎使臺北到臺南之間的交通斷絕。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272 ~ 273

註五七：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271

註五八：FO 228/1199 · Tainan 16 · Feb · 1895 · Hurst to O'Connor · P61

註五九：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三日，黑旗軍將英商所屬的安平號船艦拖曳上岸，威脅其性命且拿走大量財物，完全不顧及船員的立場與抗議，這次事件引起英商相當的不滿，甚至從此拒絕乘載政府軍隊與所需物資，直到政府出面解決這次事件且賠清所有款項才肯罷休。劉永福在這次事件中處置了多位士兵，也曾派劉成良專程拜訪胡力穡，為這件事件做說明及道歉，此即所謂「安平號事件」。詳見 FO 228/1199 · Tainan 16 · Feb · 1895 · Hurst to O'Connor · P62 ~ 63 · Tainan 23 · Feb · 1895 · Hurst to O'Connor · P69

註六〇：FO 228/1199 · Tainan 16 · Feb · 1895 · Hurst to O'Connor · P63 · 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269



註六一：FO 228/1199 · Tainan 23 · Feb · 1895 · Hurst to O'Connor · P68 ~ 69

註六二：FO 228/1199 · Tainan 28 · Feb · 1895 · Hurst to W. C. Forsych (Senior Naval officer) · P79

註六三：FO 228/1199 · Tainan 21 · Apr · 1895 · Hurst to Liu Yung - fu · P149 ~ 150

註六四：FO 228/1199 · Tainan 25 · June · 1895 · Hurst to W. C. Forsych (Senior Naval officer) · P343

註六五：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346 · 353

註六六：FO 228/1199 · Tainan 7 · May · 1895 · Hurst to O'Connor · P168 ~ 170：例如在五月一日發生的大里霧事件，有超過二〇〇人的盜賊在英商運送財貨的途中，將之搶劫，造成英商損失慘重。FO 228/1199 · Tainan 23 · May · 1895 · Hurst to O'Connor · P175 ~ 176：又

我們可以從Davidson的敘述當中得見當時軍隊所造成的亂象。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269 ~ 273

註六七：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262

註六八：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348 ~ 349

註六九：當時居住在臺南的英國籍醫生邁爾斯向英國當局密報臺灣情況，即言，臺灣軍隊人數雖多，卻因管理不當而素質不佳，不過這種情況在劉永福率領黑旗軍到臺灣來，經過全臺的視察之後，不僅形勢有所起色，劉永福所擅長的遊擊式的作戰方式也是值得注意的。給予劉永福及黑旗軍相當的肯定。〈

臺灣情況備忘錄〉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國外交文件〉收錄於《中日戰爭》第十一冊 P643 ~ 645

註七〇：思痛子，〈臺海思慟錄〉，P4

註七一：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收錄於《臺海思慟錄》，P55

註七二：思痛子，〈臺海思慟錄〉，P12；吳德功所言只兩千餘兩，概已是在後來，見吳德功，〈讓臺記〉收錄於，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割臺三記》，P42

註七三：思痛子，〈臺海思慟錄〉，P16：連橫亦言：「初臺南獨立之時，道庫僅存七萬餘兩，府庫亦六萬餘兩」。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大通書局，一九八七），〈獨立紀〉，P99

註七四：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P250

註七五：思痛子，〈臺海思慟錄〉，P16

註七六：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79 ~ 380

註七七：Albrecht Wirth 著 周學普譯，〈臺灣之歷史〉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研究叢刊第五十四種《臺灣經濟史》第六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五七），P70

註七八：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351 · FO 228/1199 · Tainan 15 · July · 1895 · Hurst to O'Connor · P349

註七九：當時海關的臺南關辦公室在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已從打狗遷移到安平。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領臺灣北部，已於六月九日接收淡水關，而臺南關的結束是在六月二十九日。分見於W. F. Spinney · " Tainan Trade Report — for 1894 " · H. B. Morse · " Tamsui Trade Report — for 1895 " · W. F. Spinney · " Tainan Trade



Report — for 1895, 收錄於《清代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第二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七), P1065, 1085, 1105

註八〇: FO 228/1199 · Tainan 15 · July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349 ~ 350

註八一: 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5

註八二: 陳文添,〈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的對外交涉——以收回四處通商港口之交涉為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專題研究論文單行本(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八),P23

註八三: 吳質卿,〈臺灣戰爭記〉,《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 · P103

註八四: 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5

註八五: FO 228/1199 · Tainan 15 · July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351 ~ 352

註八六: 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6

註八七: 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P251 · FO 228/1199 · Tainan 12 · Aug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366

註八八: 連橫,《臺灣通史》,〈獨立紀〉,P100, 102 · 易順鼎,《魂南記》,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三),P11 ~ 15

註八九: 吳質卿,〈臺灣戰爭記〉,收錄於《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 · P92

註九〇: FO 228/1199 · Tainan 12 · Aug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366 ~ 367 · 連橫:「設官票局於府志,以郊

商莊明德辦之,權發銀票」,莊明德即莊序端。《臺灣通史》,〈度支志〉, P 213

註九一: 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 · 30 · 1895 及 Nov · 23 · 1895 · by James W. Davidson · 轉引自曾澤祿,〈「臺灣民主國」的官銀票發行一百年〉收錄於《臺灣文獻》四七:三(一九九六·九),P150。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註九二: 曾澤祿,〈「臺灣民主國」的官銀票發行一百年〉,收錄於《臺灣文獻》四七:三(一九九六·九),P152 · 關於發行日期乃曾澤祿與賴建銘據其所收藏之實物所言,賴建銘,〈臺灣民主國郵票〉,收錄於《臺南文化》二:三(一九五二·九) · P38

註九三: 連橫,《臺灣通史》,〈度支志〉, P 213 ~ 214 · 另,官銀票樣式請見附圖。

註九四: FO 228/1199 · Tainan 12 · Aug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366 ~ 367

註九五: 蘇震,〈光復前臺灣貨幣制度之演變〉,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研究論叢第二十五種》《臺灣經濟史初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五四) · P4

註九六: 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352 · 曾澤祿,〈「臺灣民主國」的官銀票發行一百年〉,收錄於《臺灣文獻》四七:三(一九九六·九),P152 ~ 153

註九七: 賴建銘,〈臺灣民主國郵票〉,收錄於《臺南文化》二:三(一九五二·九),P38 · 曾澤祿,〈「臺灣民主國」的官銀票發行一百年〉,收錄於《臺灣文獻》四七:三(一九九六·九),P152

註九八: 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收錄於《臺海思慟錄》,P63



- 註九九：吳質卿，〈臺灣戰爭記〉，收錄於《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P95
- 註一〇〇：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P251；賴建銘，〈臺灣民主國郵票〉，收錄於《臺南文化》二：三（一九五二：九），P38
- 註一〇一：易順鼎，〈魂南記〉，P16
- 註一〇二：吳質卿言臺灣股份票與郵票共得數千兩，而郵票之發行確知概有五千兩，所以臺灣股份票收入確定在五千兩以下。吳質卿，〈臺灣戰爭記〉，收錄於《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P103
- 註一〇三：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2；連橫亦言「……餉匱械絀。……稅務司麥嘉林請設郵政局」，連橫，〈臺灣通史〉，〈獨立紀〉，P100。
- 註一〇四：賴建銘，〈臺灣民主國郵票〉，收錄於《臺南文化》二：三（一九五二：九），P35
- 註一〇五：連橫，〈臺灣通史〉，〈郵傳志〉，P535
- 註一〇六：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352
- 註一〇七：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2
- 註一〇八：吳質卿，〈臺灣戰爭記〉，收錄於《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P92
- 註一〇九：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2
- 註一一〇：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 P352
- 註一一一：賴建銘據戴維遜文稿推斷，郵票早在七月三十一日即已第一次發行，〈臺灣民主國郵票〉，收錄於《臺南文化》二：三（一九五二：九），P37；而據吳質卿所記載，他與麥嘉林相商發行郵票以籌款項的日期是在八月十日這一條目。這是不矛盾的，因為在同一條目下吳質卿亦記載發行郵票已得銀五千兩，所以郵票的發行一定是在八月十日以前，吳質卿八月十日此條目的記載可以將之視為得知郵票收入五千兩之後的追憶。吳質卿，〈臺灣戰爭記〉，收錄於《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P92
- 註一二二：吳質卿，〈臺灣戰爭記〉，收錄於《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P92
- 註一二三：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錄繪〉，（臺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原東京東陽堂發行《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P411
- 註一二四：FO 228/1199 · Tainan 14 · June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299 ~ 333
- 註一二五：FO 228/1199 · Tainan 14 · June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300 ~ 301
- 註一二六：思痛子，〈臺海思慟錄〉，P13
- 註一二七：羅惇融，〈割臺記〉收錄於《割臺三記》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P4 ~ 5
- 註一二八：黃昭堂著 廖為智譯，〈臺灣民主國之研究〉，（臺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一九九二），P156 ~ 159
- 註一二九：其稱之為「[the autocrat of the island] FO 228/1199 · Tainan 15 · July · 1895 · Hurst to O'Conor · P351
- 註一二〇：林樂知主編，清末民初報刊叢編之四《萬國公報》第二十四冊，一八九五年十月〈選紳設院〉（臺北：華文



- 書局印行，一九六八），P15573~15574
- 註一二一：樺山資紀，〈樺山總督臺南巡行日記〉附記臺南府，收錄於洪敏麟編《日本據臺初期重要檔案》（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七八），P217
- 註一二二：吳質卿，〈臺灣戰爭記〉，收錄於《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P100
- 註一二三：吳德功，〈讓臺記〉收錄於《割臺三記》，P51
- 註一二四：連橫，〈臺灣通史〉，〈獨立紀〉，P97
- 註一二五：James W. Davidson，〈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P351《北華捷報》一八九五年十月一日，轉引自陳彪，〈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的交合點——臺灣民主國〉，《中國近代史》六（一九八六·六），P185
- 註一二六：就吳質卿〈臺灣戰爭記〉記載，民主國的議會常常需要集會討論事情，即如糧餉問題越來越困難的八月份，議會便集會討論：八月五日「與劉公談籌餉事。余極力贊銀票之美，與議院諸生議定……」；八月六日「余在議院聽議事」；八月十日，「余至議院，聞諸紳等籌餉之法」；八月十五日「議院議定余往署鳳山縣事」；即如此例。收錄於《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P91~92
- 註一二七：Harry J. Lamley 著 吳密察、蔡志祥譯，〈一八九五年之臺灣民主國——近代中國史上一段意味深遠的插曲〉，收錄於黃富三編《臺灣史論叢》第一輯，P306
- 註一二八：戴逸 楊東梁 華立，〈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P240
- 註一二九：易順鼎，〈魂南記〉，P16
- 註一三〇：吳質卿，〈臺灣戰爭記〉，收錄於《近代史資料》三（一九六二），P92
- 註一三一：許贊堃，〈窺園先生傳〉，收錄於許南英《窺園留草》臺灣歷史文獻叢刊，P236~237
- 註一三二：據吳德功記述，五段防守情形如下：「東段舉人林際春，西段職生李清泉，南段職生吳敦迎，北段職生曾兆琦，中段舉人林鴻藻」，然而對於五段防守之範圍與界限，未有進一步的資料。吳德功，〈讓臺記〉收錄於《割臺三記》，P51
- 註一三三：謝雪漁，〈乙未抗日雜記〉，《臺北文物》九：一（一九六〇），P79
- 註一三四：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1
- 註一三五：Johnston，China and Formosa · P:329。此轉引自前島信次，〈巴克禮と宋忠堅—劉永福の逃亡〉，收錄於《臺灣時報》（昭和十一年三月），P129
- 註一三六：前島信次，〈巴克禮と宋忠堅—八重山艦の追跡〉，收錄於《臺灣時報》（昭和十一年四月），P130
- 註一三七：Edward Band，"Barclay of Formosa"，（東京：教文館，一九三六），P 89
- 註一三八：W.F. Spinney，"Tainan Trade Report — for 1894"，收錄於《清代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第二冊，P380
- 註一三九：FO 228/1199 · 25 · June · 1895 · Hurst to W.C. Forsyth · P343 · FO 228/1199 · Tainan 28 · June · 1895 · W.C. Forsyth to Hurst · P344 · FO 228/1199 · 30 · June · 1895 · Lui yung - fu to Hurst · P347~348
- 註一四〇：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1



註一四一：即如對待戰俘的方法，劉永福本以中國的方式將捉來的日

軍吊死懸掛在大馬路上，但經胡力穡以國際公法勸告之，劉永福馬上禮貌地回覆他將會遵從胡力穡的勸告，這當然讓胡力穡等外國人對於劉永福的觀感更加地好。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3 ~ 384

註一四二：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

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7

註一四三：FO 228/1199 · 22 · Apr · 1895 · Hurst to Act-

ing Taotai of Formosa · P152

註一四四：陳文添，〈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的對外交涉——以收回四

處通商港口之交涉為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專題研

究論文單行本 · P 33 ~ 36

註一四五：前島信次，〈巴克禮と宋忠堅—劉永福の逃亡〉，收錄

於《臺灣時報》（昭和十一年二月）· P129

註一四六：胡力穡亦明白提出，劉永福確實對歐人友善，但確有他自

私的理由，他簡單地提到如上三點。FO 228/1199 ·

Hurst · Taina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

ter ended 30 · Sep · 1895 · P384 ~ 385

註一四七：閩報乙未十月，〈臺灣隨筆〉，附錄於吳德功，〈讓臺記

〉收錄於《割臺三記》，P75

# 【參考書目】

## （一）史料

### 中文

- 一、《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臺北 文海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 二、《清季外交史料》臺北 文海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

三、趙爾巽等《清史稿》臺北 洪氏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

四、王樹枏編《張文襄公全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七輯 臺北文海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五、易順鼎《魂南記》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九三年

六、許南英《窺園留草》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九三年

七、思痛子《臺海思慟錄》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

八、洪棄生《瀛海偕亡記》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九三年

九、吳德功《讓臺記》臺灣歷史文獻叢刊第七輯 臺北 臺灣大通書局 一九八七年

十、羅惇融《割臺記》臺灣歷史文獻叢刊第七輯 臺北 臺灣大通書局 一九八七年

十一、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啓》收於沈雲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八五輯 臺北 文海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

十二、林樂知主編 清末民初報刊叢編之四《萬國公報》第二十四冊 臺北 華文書局印行 一九六八年

十三、連橫《臺灣通史》臺北 臺灣大通書局 一九八四

十四、洪敏麟編《日本據臺初期重要檔案》臺中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七八年

十五、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一九九五年〔原日本參謀部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

十六、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臺北 遠流出版公司 一九九五年〔原東京 東陽堂發行《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

十七、戚其章主編《中日戰爭》第十一冊 北京 中華書局 一九九



六年

外文

一、《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上冊 臺北 捷幼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二、Edward Band 著 "Barclay of Formosa" 東京 教文館 一九三六年

三、James W. Davidson 著 "The Island of Formosa—Past and Present" 臺北南天書局印行 一九九二年

四、《清代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第二冊 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一九九七年

五、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Record (Microfilm) ·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 · China · Correspondence · (Taiwan) · 228/1164 (1894AD) 及 228/1199 (1895AD · 臺南為主) · 228/1200 (1895AD · 淡水為主) · 262/735

(一) 專書

一、羅香林編著《劉永福歷史草》臺北 正中書局印行 一九七〇年

二、李健兒《劉永福傳》臺北 臺灣商務 一九七〇年

三、蘇震《光復前臺灣貨幣制度之演變》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研究論叢第二十五種《臺灣經濟史初集》臺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一九五四年

四、Albrecht Wirth 著 周學普譯·〈臺灣之歷史〉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臺灣研究叢刊第五十四種《臺灣經濟史六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一九五七年

五、黃富三 曹永和主編《臺灣史論叢》第一輯 臺北衆文圖書公司 一九八〇年

六、戚其章《中日甲午戰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

七、黃昭堂著 廖為智譯《臺灣民主國之研究》臺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一九九三年

八、戴逸 楊東梁 華立 共著《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九、喜安幸夫《臺灣抗日秘史》臺北 武陵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十、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 東京 刀江書院 一九六五年印行

(三) 期刊論文

一、謝雪漁〈乙未抗日雜記〉《臺北文物》九：一臺北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一九六〇年三月

二、吳質卿〈臺灣戰爭記〉收錄於《近代史資料》第三期 一九六二年

三、梁華璜〈甲午戰爭前日本並吞臺灣的醞釀及其動機〉《臺灣文獻》二六：二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八五年六月

四、陳彪〈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的交合點——臺灣民主國〉《中國近代史》第六期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一九八六年六月

五、王世慶〈乙未割臺與日本兵遣送清文武官兵始末〉《臺灣風物》三八：二 臺北縣 臺灣風物雜誌社 一九八八年六月

六、曾澤祿〈臺灣民主國的官銀票發行一百年〉《臺灣文獻》四七：三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九六年九月

七、陳文添〈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的對外交涉——以收回四處通商港口之交涉為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專題研究論文單行本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九八年一月

八、前島信次〈巴克禮と宋忠堅——劉永福の逃亡〉《臺灣時報》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三月)臺北 臺灣時報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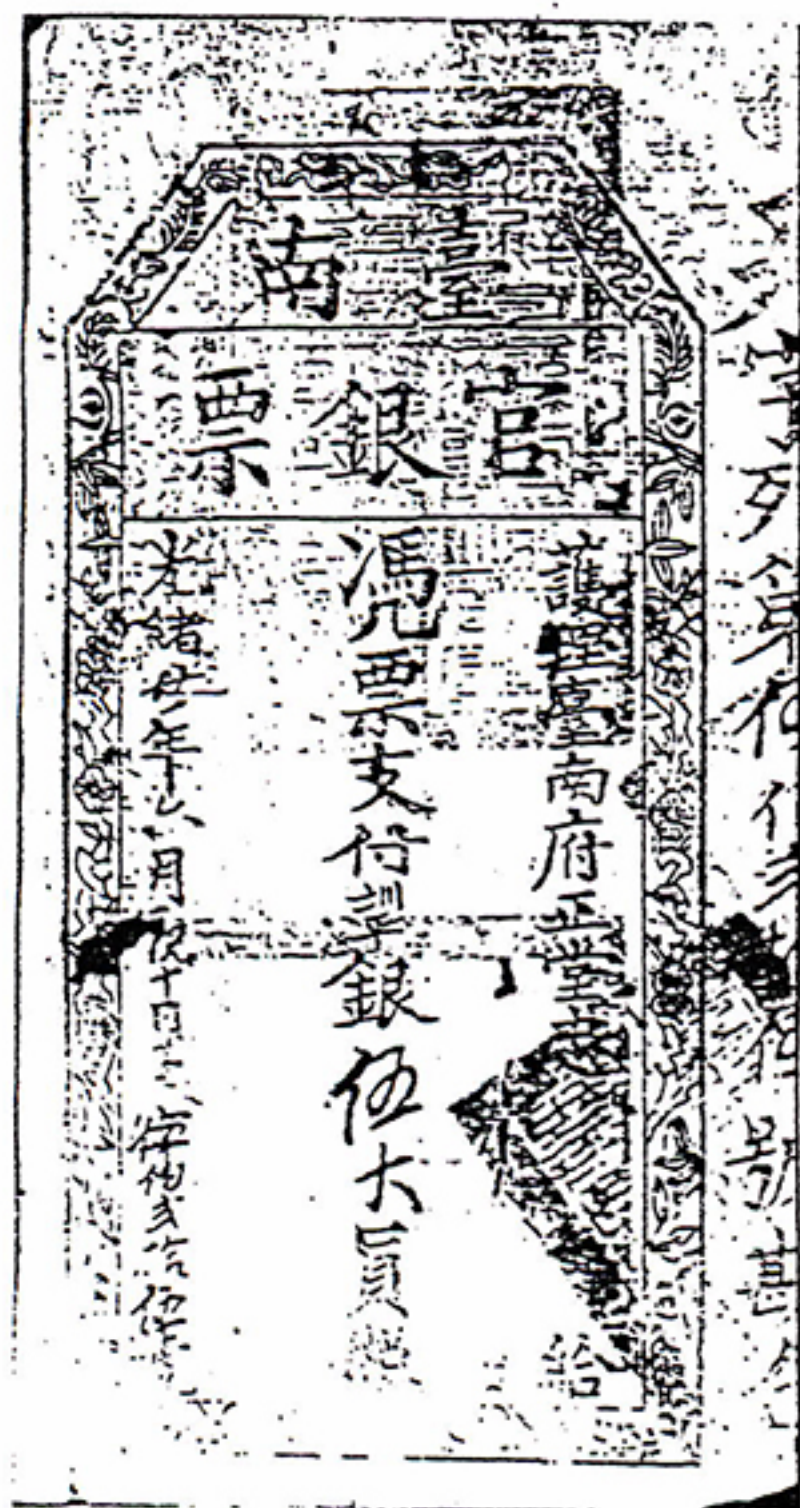
九、前島信次〈巴克禮と宋忠堅——八重山艦の追跡〉《臺灣時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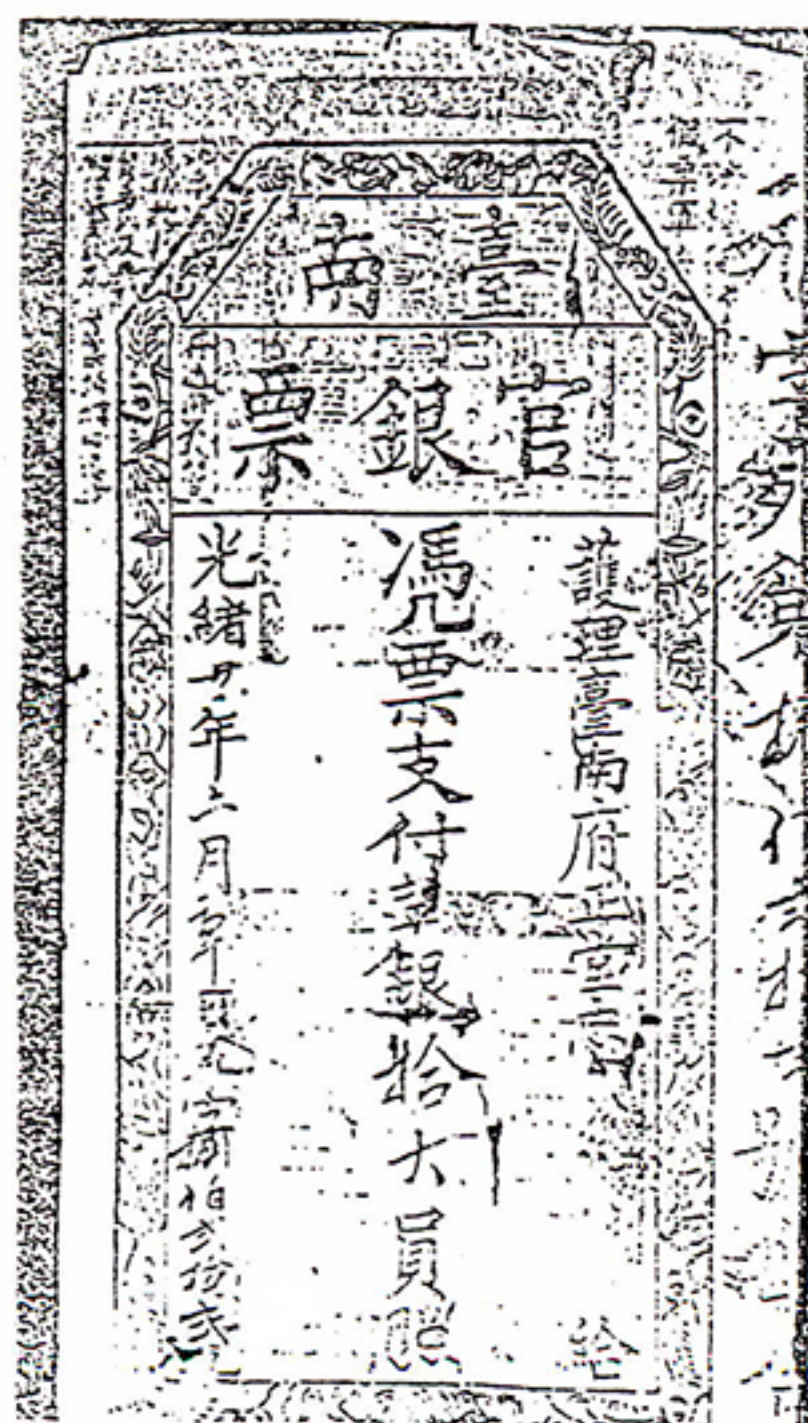
附圖

臺灣民主國發行之官銀票

引自曾澤祿〈『台灣民主國』的官銀發行一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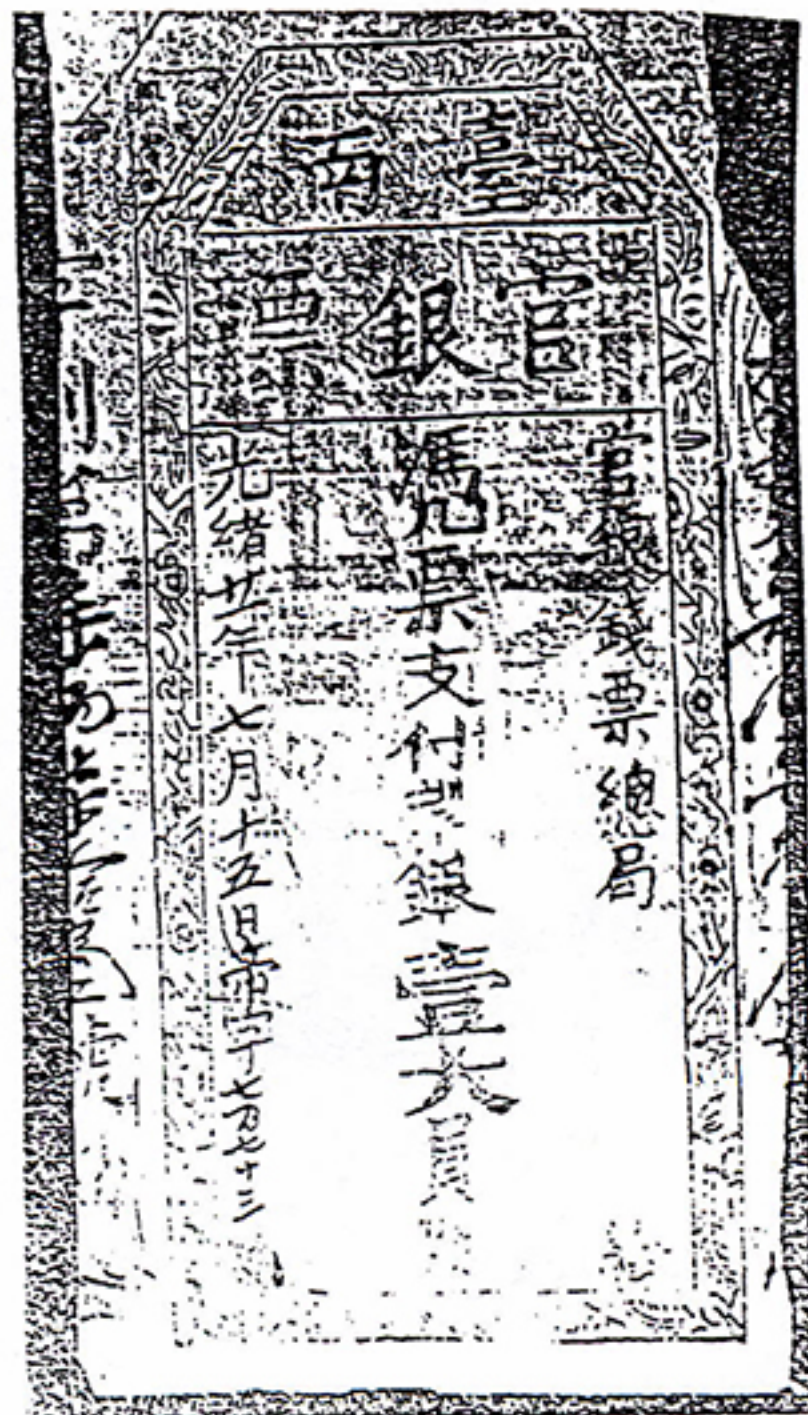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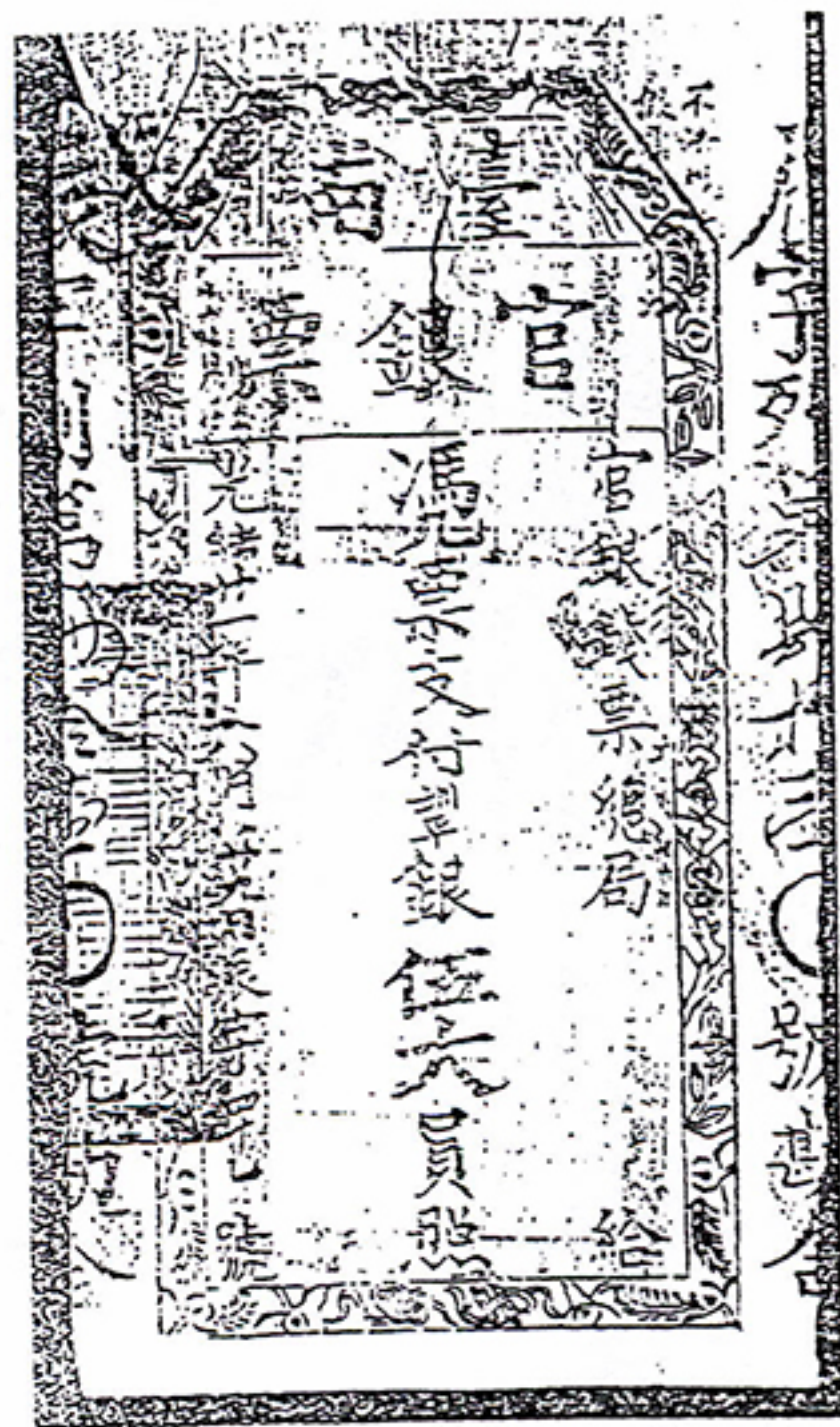


護理台南正堂忠所發行之  
一、五、拾 元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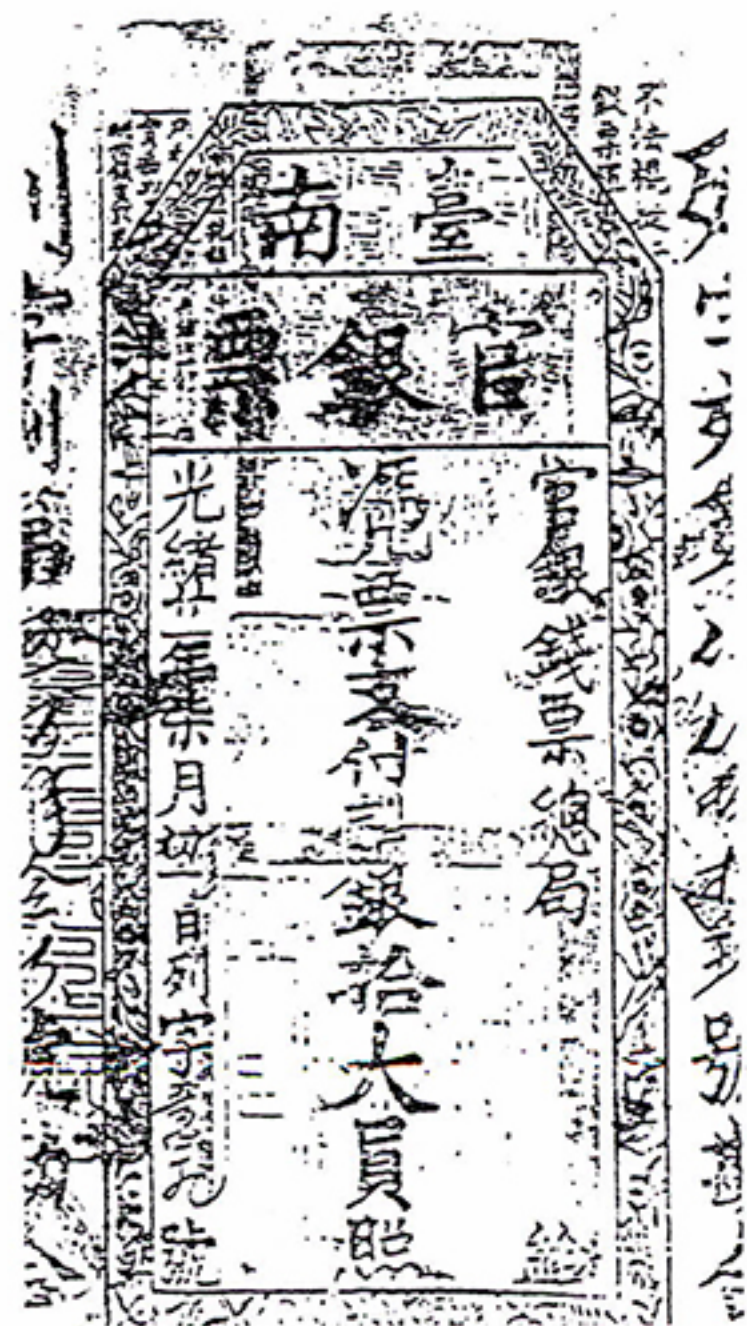


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四月）臺北 臺灣時報發行所  
十、前島信次（巴克禮）と宋忠堅—臺南府恐怖の的一日（臺灣時報）  
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五月）臺北 臺灣時報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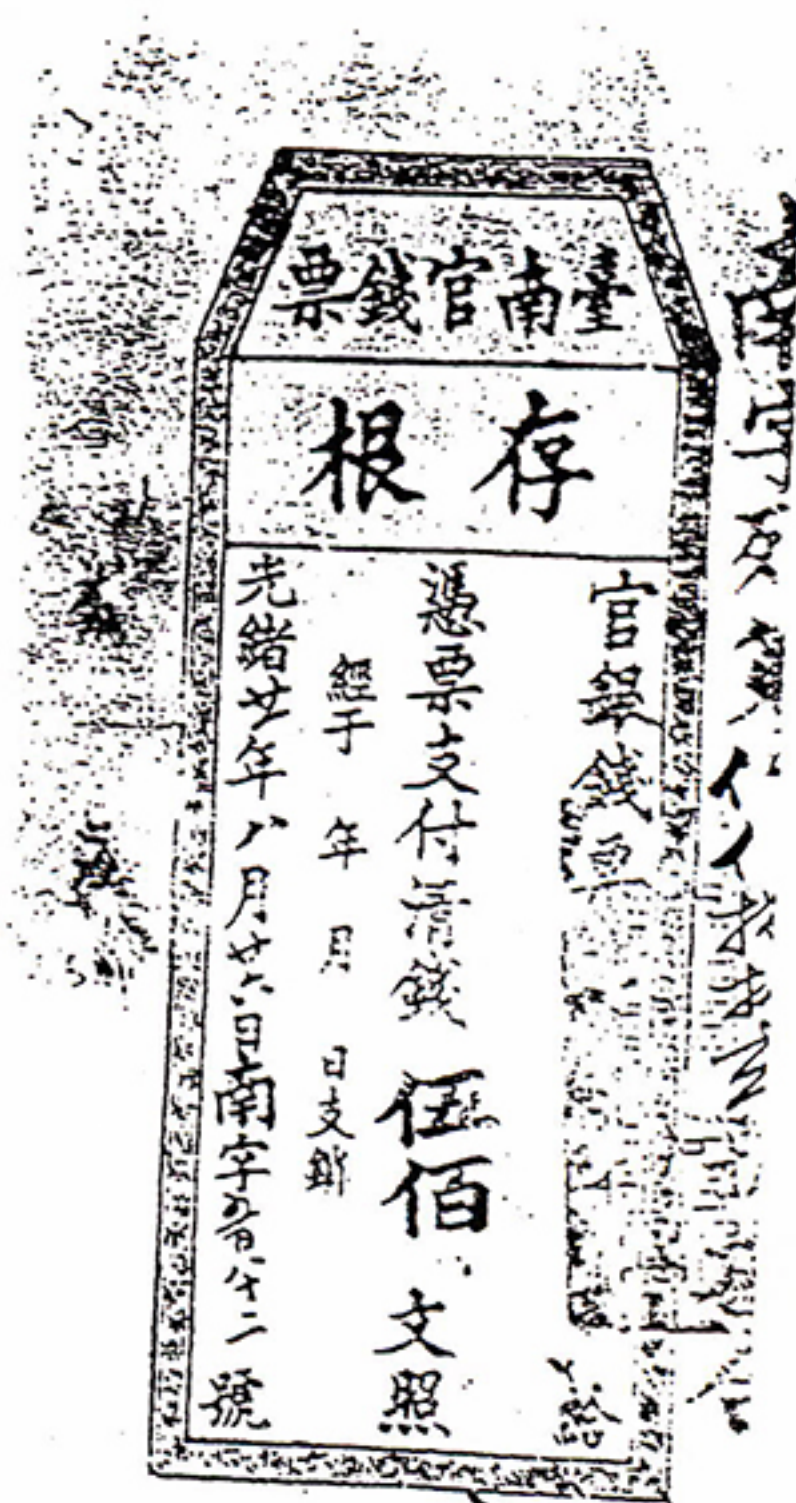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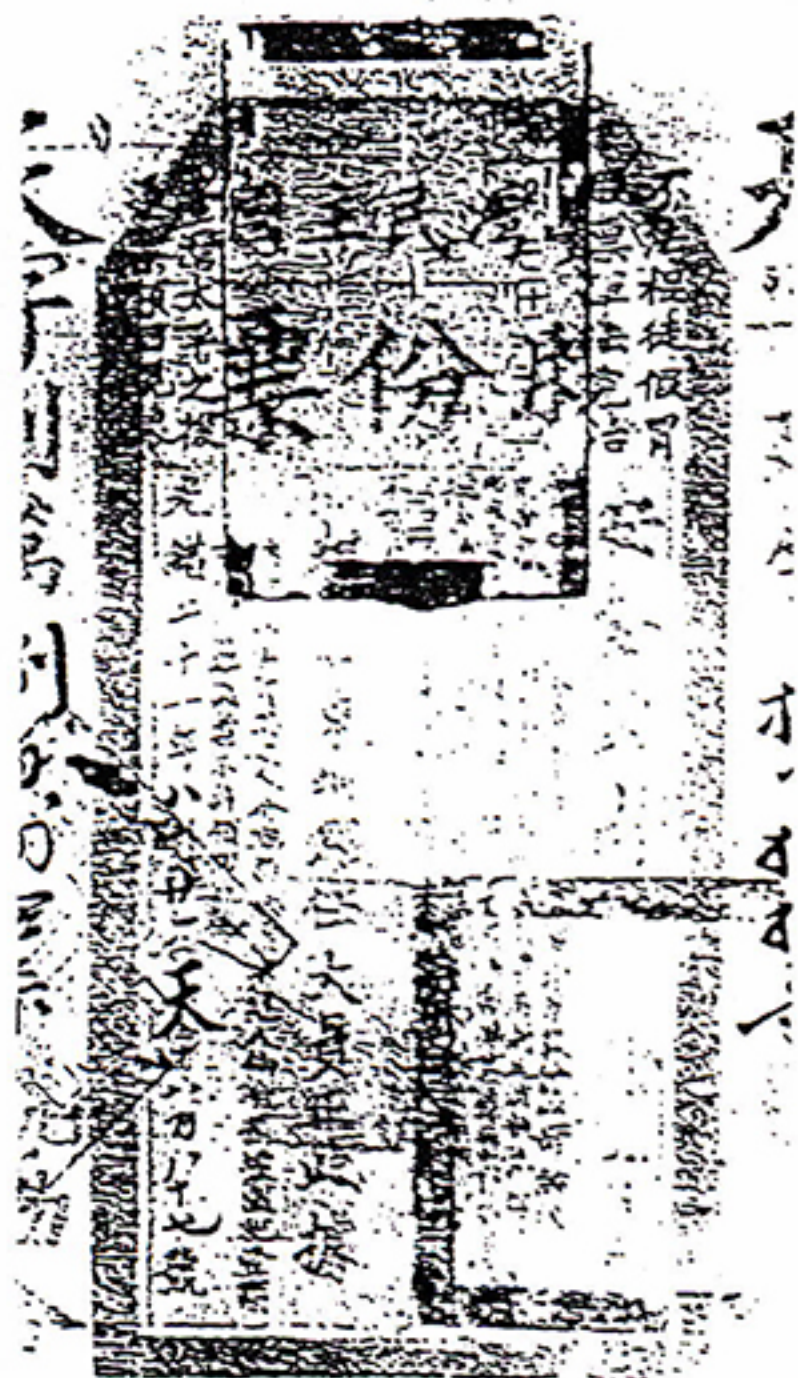




官銀錢票總局 所發行之  
一、五、拾 元額







### 作者簡介

謝佳卿，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對歷史學的探究相當有興趣，目前任教於高中。